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4年9月30日第40期（增刊）

本期目录

【启之文革研究专辑】

访谈

[纽约时报中文网 曹海丽 与启之对话：关于文革的记忆（完整版）](#)

书海泛舟

内蒙文革第一枪（《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选读）

[《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后记](#)

[激进文艺思潮再起（《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选读）](#)

[《揭密中国电影 读解文革影片》自序](#)

[电影《艳阳天》读解（《揭密中国电影 读解文革影片》选读）](#)

[“红色话语”：词汇（《毛泽东时代的语言》选读）](#)

【启之文革研究专辑】

说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作者、国防大学教授王年一得知一个让文革研究者兴奋不已的消息：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和国防大学四个单位要成立一个文革研究所，当时在中央主管宣传的胡启立已经批准。他将消息转告给一些朋友后，一个北大中文系研究生连夜跑到他家报名。这第一个报名想进文革研究所的年轻人就是吴迪。尽管文革研究所后来没有如愿诞生，而且文革研究还一年年愈加如履如临，但吴迪仍坚持做着自己的研究，特别是在对内蒙文革、毛泽东时代的电影及思想文化史方面的文革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因同姓名者甚多，且多人以“吴迪”之名著书发文，遂以“启之”之名写作。退休后，他全力投入民间电子刊物《记忆》的编辑，为毛时代的历史研究积累了大量学术成果及资讯。其主要著述有：《中西风马牛》，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世界图书出版社，2014再版；《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台湾，秀威，2010；《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香港，天行健，2010；《错乱狂飚毛时代》，

台湾，秀威，2013；《揭密中国电影 读解文革影片》，台湾，秀威，2013。

【访谈】

与启之对话：关于文革的记忆

(完整版)

纽约时报中文网 曹海丽

时间：2014 年 7 月 17 日

六年前，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启之（本名吴迪）与重庆的何蜀先生，合办了一份跟文革有关的电子刊物，取名《记忆》，意在“留住人们关于文革的文字”。促使他们产生这一念头的原因很简单：启之写的有关文革的书无法在大陆出版，他就想用这个平台发表那些分享同样命运的文字，然后通过邮件发送给学界同仁。开始，他们担心稿源，没想到《记忆》甫一问世，外稿就蜂拥而至，以至于他们自己的文章都排不上队了。2011 年底，何蜀与启之分手，在重庆创办了《记忆》的兄弟刊物《昨天》。此刊一出，同样是外稿如云，为了不积压稿件，何蜀不得不跟《记忆》一样，经常出增刊。这种意想不到的反响，说明了“供求关系”——社会急需一个倾诉浩劫、反思历史的出口。（上图为启之近照）



启之出生于北京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1966 年文革开始的时候，他是北京四中一名初二年级的学生，喜欢读书的他在这场席卷全国的暴力革命采取了消极避世的态度，大部分时间躲在图书馆里看书。两年后，他到内蒙插队，刚下去不久，即蒙牢狱之灾。在狱中，他认识了不少“内人党”。1971 年底，他被抽调到内蒙铸锻厂做混沙工（为翻砂造模备料的非技术熟练工），一干就是六年。这六年间，他结识了更多的“内人党”和造反派，造成了 16222 人的惨死的“挖肃”运动，使他暗下决心，要弄清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八十年代上研究生时，他要研究文革，但因专业所限，此愿未了。毕业后，他一边在北京教书，一边跑内蒙搜集资料，1991 年完成了长达 49 万字的《内蒙文革实录——从“民族分裂”到“挖肃”运动》。四年后（1995 年），西方学者摘译的英文版在斯德哥尔摩出版，19 年后（2010 年），中文版才在香港问世。而他为国内写的《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在国内碰壁多年之后，2011 年才在台湾付梓。这本书还只是写文革前十七年的

电影史，只因为它是史学家所说的“非常史”，所以出不了。他写的文革电影史就更不必提了。启之给自己的定位是学者——以读书写作为生的人。他写了六本书，但只有《中西风马牛》这种“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才能在国内出版，在海外出的书，国内读者很难看到。他在大学开讲座的时候，有些学生拿着他在香港台湾出的书找他签名，让他既感动又抱歉。

如果不是今年年初宋彬彬道歉一事引起如此大的社会争议，启之和他的《记忆》可能至今仍保持着一贯的低调。启之称自己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也很少参与公众发言和讨论。文革虽然在国内是一个敏感话题，但由于《记忆》没有网站，只靠朋友间的通信存在，加之传播数量非常小，所以存活至今。

其实，早在 2010 年 4 月，《记忆》就刊发了北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这个专辑登载了这所学校的校友叶维丽的论文，刘进、冯敬兰等人的口述、刘沂伦的回忆文章，以及相关的史料。此后《记忆》一共刊发了六个专辑，研讨这个学校发生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文革历史。这所北京著名的女校，在文革之初（1966 年 8 月 5 日）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暴行——该校的副校长卞仲耘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她的学生，一群花季少女殴打折磨致死。13 天后，该校的高三学生，中共开国元勋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得知她的名字来自于“文质彬彬”，就对她说：“要武嘛。”此后，以“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以抄家打人为实的红卫兵运动进入高潮。据《北京日报》1980 年 12 月 20 日报道，短短一个月内，北京就打死了 1772 人。而宋彬彬则因为给毛主席戴红袖章而成为红卫兵血腥暴力的符号。

2012 年 1 月，《记忆》发表了宋彬彬的《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虽然一周后，此文就上了网。但是，由于没有社会媒体的参与，并未在社会上引起特别大的关注。去年年底，陈毅之子陈小鲁道歉经媒体报道引起广泛关注后，女附中的校友受到鼓舞，与《记忆》在北大法学院共同举办了反思文革座谈会，随后，女附中老三届又召开了与老教师的见面会。会上，宋彬彬等老三届的学生向老教师们道歉，并与老师们共同控诉、反思文革给教育、给青年一代、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

在启之等人的力主之下，这两个会议邀请了《南方周末》等少数媒体记者参加。不曾想，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当年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以及父亲是中共开国上将的关系，宋彬彬成了两种政治符号——文革暴力符号和“红二代”当官发财符号的兼任者，虽然她在文革结束后不久便前往美国留学，之后在美国过着普通职员的生活，既未当官，也没发财。她的道歉引来了无数的质疑、痛斥、谴责，以至咒骂。受女附中启发，准备以之为模板，与中学老师共同反思文革的某些北京老三届，在这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声中怯步不前。启之试图以《记忆》为平

台，将民间反思文革推向纵深的计划也由此泡汤。

5月18日，启之接受了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专访，就如何看待宋彬彬道歉引发的争议，和如何反思文革等话题进行了探讨。

纽约时报中文网：

在你看来，宋彬彬的道歉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社会争议？

启之：

这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宋彬彬兼备两种符号，在她道歉之前，她是红卫兵滥杀无辜的暴力符号。而在她道歉之后，她又成了红二代在改革中利用特权发财升官的符号。另一方面，社会主流的看法是，那些在文革初期有血债（打死打残“黑五类”或“走资派”）的老红卫兵，非但没有受到追究，有的甚至升官发财。尽管这种看法与事实有一定距离，但是，由于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学界无法客观公正地研究这段历史，于是那些没有血债的干部子女和整个红二代，就不得不为那些有血债的同伴们背黑锅。宋彬彬就是这个背黑锅的典型。这对于她是不公正的。

问题是，宋彬彬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不公——成千上万的人被迫害致死，而施害者即便没升官发财，也逍遥法外。当那些无辜的受害者是以“黑五类”为主体的平民百姓，那些施害者则是以干部子女为主体的“红五类”的时候。你说，这种迫害，是不是阶级迫害？

纽约时报中文网：

怎么看待宋彬彬成为这两种符号？

启之：

宋彬彬在“八五事件”中并没有打师长，她还劝阻了打人的学生。她的家庭在文革中也受到了迫害。但是，谴责派并不顾及这些事实，不想让宋去符号化。因为他们要用这个符号来达到历史研究之外的目的。换句话说，对谴责派来说，宋彬彬只是他们诉诸现实政治的一个工具，把宋彬彬符号化，只是他们实现其更高目的的一个手段。在某些诉求上，我与谴责派是一致的，但在这件事情上，我与他们不一致——《记忆》以学术立身，以历史研究自命。它要在历史的复杂性、细微处和含糊点上下功夫。谴责派是拿历史说事，有的人则是作秀出风头。

纽约时报中文网：

有血债的老红卫兵为什么没有受到惩办？

启之：

说起来话长了，这是红卫兵运动研究中的一个课题。直接的原因是八十年代制订的政策。我为此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分析1979年胡耀邦对彭小蒙（北大

附中红旗）来信的批示，一篇是分析 1984 年陈云对孔丹来信的批示。可惜它们在国内无法发表。但是我能做到的是在《记忆》上发表彭小蒙给胡耀邦的信，孔丹给陈云的信（《记忆》第 112 期）。简单地说，胡耀邦的批示只是说了一番如何教育青年的套话，陈云的批示则使有血债的老红卫兵逍遥法外，其中一些人还被列入“第三梯队”，受到了提拔重用。比如贺龙的儿子贺鹏飞，作为“八二四事件”（1966 年 8 月 24 日）的领导者，不但指挥北京市 12 所学校的上千名红卫兵，拆毁了清华二校门，然后强迫大批教师清理二校门的残砖破瓦，而且组织清华红卫兵对数百名教师进行了毒打，其中包括著名科学家钱伟长。罗征启的回忆录清楚地记录了贺鹏飞的大皮鞋是如何把他的头踩到地上，使他头上已经结了痂的伤口又滴下许多血的情形。又比如，被号称为将军的干部子女马楠，把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蒋南翔的继母当着蒋的面吊起来毒打。手段恶劣，令人发指，这些人在清华实行了长达半个月的“红色恐怖”。而在陈云的批示之下，全部解脱。马楠所受到的处理，仅仅是不记档案的口头批评。贺鹏飞后来参军提干，官至海军副司令员。

纽约时报中文网：

你是文革研究者，又办了《记忆》这样的刊物，你认为应该如何总结教训，如何反思历史？

启之：

总结教训，反思历史，从操作层面上讲，有好多事可做。

比如，抢救史料。最要紧的是请亲历者口述，请有写作能力的人撰写回忆录。这些人都七老八十了，一批一批地走了。他们脑袋里装的是活史料。不抢救下来，就会永远地消失了。

其次，是整理当年的小报传单，把它们电子化。有一位文革资料收集者，攒了三间屋子小报传单，东西多得屋里放不下，放到了阳台的书柜里，结果阳台漏雨，把那些资料全部泡在水里了。很可惜。

《记忆》这些年做的工作之一，就是抢救资料：访谈，录入、扫描、复印、归类、编目。很枯燥、很繁琐、很寂寞、冷板凳。雇人，没钱。请义工，谁来？只能自己干。不过自己干也有好处，第一，你心里踏实，不用担心把原始资料弄丢弄坏。第二你有效率。反正全是你的事，早干完了早歇着。北大有个什么研究中心要跟《记忆》合作，我没答应。一是这些衙门做事没效率，我一天复印二十本资料。他们两年也复印不了一本资料。二是资料一到它们手里，就泥牛入海。连搞专业研究的都不能看。

纽约时报中文网：

从研究层面，应该做些什么呢？你怎么评价近年来的文革研究？

启之：

二十年前，我写内蒙文革的时候，还是“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研究在国外”。现在不好这样说了，尽管国外也有不少重要的著作，但从深度和广度上，已经落后于国内。国内的研究者多是五〇后，他们有历史现场的经验，又有理论和史料的积累。香港中文大学出的那套十卷本的共和国史，其中有三本讲的是文革，它们标志着文革研究的主力已经回到了国内。

但是，我认为，研究的重点应该从政治史转向思想文化上来。胡耀邦说，“十年浩劫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遭受到那么大的灾难，受到那么大的损失，好好体会一下，是可以从中悟出一点道理来的。这本身是一堂很好的政治课。”我修正一下，可悟出来的道理不是一点，是一大堆。文革不仅是很好的政治课，还是很好的思想教育课，很好的“红色文化”反省课。

现在学界反思文革有两个不好的倾向，一是不重视研读史料，凭着经验和感觉发议论。这种反思很有一些。他们的言论可能轰动一时，但无非是随感或泄愤。随感式的反思，不乏警句，像林彪说的“思想的火花”，但所悟出的道理也如同电石火花，稍纵即逝。泄愤式的反思，连警句都没有，有的只是骂人出气，哗众取宠。

另一个问题，就是研究领域单一，研究视野狭窄。在档案不开放的情况下，文革政治史的研究难以为继。研究者寻章摘句，各自从回忆录里找出一句半句有利于自己的话，然后就像《三岔口》中的任堂惠和刘利华，摸着黑，你一拳我一脚，唇枪舌剑，打得不可开交。艺术里的《三岔口》还有天亮的时候，学术里的《三岔口》，不知打到什么时候才能天亮。

高层政治的研究，当然是十分重要且应该深入的，但是，它也有局限性。有一位读者给我来信，说得有些极端，但很有深度：“毛、林、江他们今天说什么，明天做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现实有什么关系？我一看那些史书就心烦。你们搞历史的，能不能告诉我，十七年教育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学生把老师往死了打？八十年代大讲‘五讲四美三热爱’，这跟文革时期的越骂人越革命有什么关系？现在提倡吃喝玩乐，娱乐至上，这是不是对当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逆反？右派们反对唱红歌，但是样板戏确实上口，难道红色文化就没有一点好处吗？……”

因此，要开拓那些不依靠档案就可以研究的领域，比如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思想文化、语言文风。近两年我一直在研究毛泽东时代的语言和语体。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1949年以后，汉语词汇的主流是政治话语、军事话语和粗口脏话。这些话语到现在仍旧盛行不衰，你比较一下台湾，就会发现语言后面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文革创造了三种语体，大批判、检讨认罪书、致敬电致敬信。

后两种语体现在看不见了。但是大批判语体仍旧活跃在我们的生活里。最重要的反思，是清理文革的思维方式。人们不断地说要防止文革重演，其实，文革不可能重演。因为有了它的发动者和领导者。要说重演，重演的是文革的思维方式。而且，它早就重演，并且当下还在重演。

比如，文革的源起，就是把学术问题政治化。批《三家村》，批《海瑞罢官》，批《清宫秘史》。通过断章取义，“五子登科”，无限上纲等手段，将对手打倒。在女附中“八五事件”中宋彬彬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是历史研究的事，而批判者同样把它政治化，继续搞学术为政治服务。再比如，大批判是“斗批改”的中心，它是文化领域的群众专政，是文字狱的现代版。搞大批判的基本心态是真理在握，居高临下。大批判文章的基本手法是歪曲事实、诛心诬陷、乱扣帽子。谴责派在批判陈小鲁、宋彬彬的时候，是同样的心态，同样的方法。

纽约时报中文网：

这些谴责引起了什么后果吗？

启之：

直接的后果，就是阻碍了对文革的反思，打断了北京老三届对本校历史的清理。北京有几个中学的老三届也想像女附中那样，在母校搞个与老师的见面会，为当年的行为向老师们道歉，师生共话当年，反思历史。可是，网上对宋彬彬和女附中团队的铺天盖地的批判声讨，让他们打消了这个念头。他们觉得：现在社会上非理性的、情绪化的力量太大，尤其是那些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公知”，鸡蛋里挑骨头，脱离实际，上纲上线，无论你说什么，他们都有理。而媒体为了吸引大众的眼球，不管他们是作秀还是求实，对他们不负责任的言论大肆宣传。这些人也以舆论领袖自居，满足于出风头的快感，不考虑社会效果。

我遇到了一件事——有一个 67 届老高二，文革初，当过一阵校革委会主任。他在学校设立了牛棚，逼迫老师们写交待，唱《嚎歌》，使老师受到很大伤害。受女附中的启发，他想给老师道歉，把发言稿给我看，发言稿上有“不但没有保护老师，还虐待老师”一类的表述。他问我，这样写是不是会被认为，他到现在还抱着干部子弟的优越感，居高临下地对待师长？——朱学勤就是这样指责宋彬彬的。

部分“公知”不顾事实，劈头盖脸的大批判，吓退了想反思文革，向老师道歉的人。他们嘴上说的是“将理性反思引向历史纵深”（朱学勤），实际上做的是，把理性反思引向了死胡同。

中国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在官权独大，大批学人放弃公共关怀，以岗位意识掩饰其犬儒逢迎之际。“公知”更形可贵。但是，要做“公知”是有条件的，不是有个教授研究员博导的头衔，能说会写，敢于发声，就够资格。我曾就此专门

写过一篇《问责“公知”》的小文，其中提到“公知”除了要在其专业内是一流学者之外，还需要具备几个条件——

第一，要有良好的学风。先调研，后发言。对于不熟悉的领域，要先补课，后说话。对于拿不准的问题，要慎思讷言。两年前，马列所的黄纪苏对媒体大谈国企改革，攀枝花钢厂负责人，原清华大学毕业的钢铁专家周家琮著文批评。周家琮由“黄纪苏现象”谈到了“公知”的学风：有些“在某一领域成绩斐然小有名气”的知识分子，“热衷扮演公共知识分子”，在外无问责，内不自律的语境中，他们“甘冒无知无畏之风险，任意指点江山。”“真的以为自己无所不知，见识超群，可以制国策、平天下、济苍生。”“奉劝精英们学一点西方知识分子的专业精神，于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谨慎发言。”如果在“公众场合，依然固守精英的身份和口气信口开河，不但容易误导官员和民众，还不免沦为有失身份的笑柄。”（周家琮：《莫把生活当舞台——就国企改革与黄纪苏商榷》共识网，2012-08-28）周家琮的这番话，可为天下“公知”诫。

第二，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何怀宏有言：“在发表或宣传自己的理论之前，宜有某种谨慎，在涉及社会的事情上，应该对常识和经验有所尊重和顾及。考虑和顾及他们的言论和理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后果。”（引自何怀宏为托马斯·索维尔著《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所写的前言。该书由张亚月、梁兴国翻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9月）换句话说，他应该是道德实践者，而不是道德的说教者。

第三，要谦虚谨慎，学会自省，学会道歉，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公知”们应该知道，自己不是全能的超人，自己的知识储备未必能保证自己永远正确。有错认错，是对社会负责，也是对自己道德的提升。

“公知”对自己的产品——言论和理念之不负责任，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一个工程师在建造桥梁时，如果过滤了特定事实，结果造成桥梁坍塌甚至伤到了人，他就会被起诉为渎职罪。但是那些被比喻成‘社会工程师’的知识分子如果过滤掉他们已知的事实，最终导致了社会灾难的话，他们却不用面对这些责任——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本没有责任。”（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页170，中信出版社，2013年9月）

问题是，不负言责并不意味着这些“公知”们不在乎自己的社会形象。恰恰相反，只要有“在道德上高人一等的机会”（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页176），他们都要跑去发声。就像某些拼命保持“出镜率”的演员，一心在公众那里“混个脸熟”，免得从“著名”榜上掉下来。

我们要求官员问责，“公知”是不是也应该问责？

在这次道歉事件中，有些“公知”就不够格。我管他们叫“三不公知”——

不了解情况，不调查研究，不接受批评。上海的朱学勤是个典型。朱对女附中的“八五事件”缺乏基本的了解。这没关系，你要发声写文，先做些调研，看看已经发表的材料吧。不看。大笔一挥，《吐尽狼奶，开口奶——从宋彬彬的道歉说起》赫然见网（[共识网](#)，2014-1-30），文章一开头就错——宋彬彬明明2012年初就公开发文道歉了，其文在网上挂了两年了，朱学勤置若罔闻，硬说宋“2007年之后整整六年，她始终沉默”。

有两个老三届的读者给《记忆》写信，对朱学勤的文章提出质疑：“我们查了《记忆》47、49、80期，查了互联网上所有有关的文件，没有发现刘进把卞案责任归于‘群众运动’，也没有发现‘宋彬彬团队立刻抓住这一正当呼声，来为她们自己开脱’。我们不知道，他这样说的根据是什么？”（[苗苗等北京老三届谈朱学勤之文，《记忆》简报联系结果。载《记忆》112期](#)）《记忆》把信转给朱学勤，朱拒绝回答。人家其实是给你提个醒——请阁下说话写文注意点儿，不要言而无据，信口开河。如果朱学勤知道谦虚谨慎，不那么自大自负，给人家回个信，承认自己一时疏忽，下次注意，事情也就完了。不，朱学勤不接受人家的好意，硬扛着，不但不给人家回信，还把《记忆》的信箱列入黑名单。

朱学勤没有继承大批判的文风，但是继承了真理在握，居高临下的心态（参见黄擎：《文艺批评话语研究：20世纪40--70年代》第三章，中国社科出版社，2011年），继承了诛心歪曲、乱扣帽子的手法。他是1952年生人，比宋彬彬只小五岁，属于同一代人，受的是大致相同的教育。朱学勤告诫宋彬彬要吐尽狼奶，要“刮骨疗毒”。他不想想自己是不是也喝了狼奶，是不是也应该刮一刮骨，疗一疗毒？

朱学勤的盲区，也是我们几代人共同的盲区。我们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接受的都是那种文化，喝的都是一样的奶，用朱学勤的话讲“毒既在骨，也在血，是胎盘里带来的病毒。”这种病毒已经铸入DNA，成了新的国民性。尽管三十多年来，包括朱学勤在内的不少深思好学之士，在努力地清理着这个带有病毒的文化。但是，要看到，一方面旧文化盘根错节，树大根深，不容易清除。另一方面，旧文化在自己身上也有残留。就整体而言，吐狼奶——反思文革，肃清流毒，是我们几代人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吐尽，不肃清，就没法普世，没法现代化。

纽约时报中文网：

这种现象背后反映的是什么？

启之：

反映了某些以“公知”自命的知识精英的浮躁轻狂，不负责任。前几年，清华人揭发朱学勤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抄袭。复旦学术规范委员会出面澄清，说朱的问题不是抄袭，而是学术规范存在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引文不加

注。朱学勤感谢复旦还他清白，却不记着复旦对他的批评。在指斥宋彬彬的时候，还是不加注。这里面有学风问题，也有心态问题。

就社会层面而言，这种现象反映了一种激进主义情绪。有了激进，就有革命。有人说，NO！有压迫，就有反抗，反抗就得革命。我不这么看，第一，反抗有各种方式，不是非革命不可。第二，有的革命是自我折腾，跟压迫没关系。有一个造反派头头跟我辩论，说毛主席发动文革，是因为帝修反压迫我们，企图让资产阶级复辟，修正主义上台，“和平演变”中国。我告诉他，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都是伪概念、假命题。我们连什么是修正主义，中国有没有资产阶级都没弄清楚，就去革它们的命，结果就是十年浩劫。可以说，文革是近百年来激进主义的总爆发。文革结束，激进主义没有得到清算，它移步换形潜藏在人们的头脑里，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出来露一小手。

这次宋彬彬道歉，激进主义就大大出了风头。因此，反思文革的第一要务，就是拒绝激进革命，回归渐进改良。我信奉李泽厚的主张，中国需要改良主义，一点一滴的改良。革命容易改良难。改良需要耐心，需要妥协，需要肚量，你要学会跟你不喜欢的人打交道；改良是持久战，是壕堑战，持久就不能硬拼，壕堑里只有灰头土脸，没有鲜花掌声。改良就要甘于寂寞，做最平常最琐碎的事。基于这一理念，我用八个字给《记忆》定位：学术，理性、包容、低调。

纽约时报中文网：

《记忆》办了六年了，在这六年中，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遇到过哪些挫折？

启之：

感受很多，最深的感受是中国的历史政策亟待改变。邓小平时代的“彻底否定文革”，实际上是把文革冷冻起来，以便搞经济。在浩劫刚刚结束，派性纷争不断，政经急待改革的情况下，这种冷处理是必要的。但是，这只能是暂时的措施，不能作为长久的治国大计。随着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历史政策应该解冻，为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做思想文化上的准备。但是，当政换了三届，文革仍在冷冻之中。它造成的负面后果越来越突显。

首先是大面积的思想混乱，因为官方回避历史真相，青年一代对父母经历过的事懵懂无知，懵懂无知就无从判断是非好坏，失去了判断力，糊涂混乱就会随之而来。举个例子，有些少壮派给《记忆》投稿，用改革中的不足和缺陷，证明文革中的斗批改是必要的。

其次，是文革那一套非黑即白，激进、偏执、狂躁的东西成为普遍的知行方式。甚至连学者专家、某些“公知”都在用文革思维、文革语言批判文革。加上前面讲的思想混乱，社会呈撕裂状，有共识网，却没有共识。对立化、碎片化非常严重，在这种理性稀少，戾气充斥的大环境中，《记忆》要坚守客观、理性、

学术，就会遇到很多麻烦，得罪很多人。

比如，在某些学术问题上，国内外的研究者有分歧。彼此互扣政治帽子，海外的说国内的学者是官方的应声虫；国内说海外的研究者迎合西方的口味。双方互相攻击，以至粗口相向。《记忆》劝大家冷静下来，互相取长补短，想一想各自的优势和局限，国内的研究者应该看到，由于语境的关系，自己确有“犬儒”的一面。国外的研究者则应该承认，由于身在海外，在资料上有欠缺，在观点上免不了有偏颇。可是，《记忆》这样做的结果，常常把自己变成了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

《记忆》很少约稿，基本上都是人家主动找上门来。女附中的找我，北大的找我，研究林彪的找我，写回忆录的找我……最初，我担心稿子不够，后来担心稿件积压。一个小小众刊物，既不发稿费，又没多大影响，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投稿呢？说明社会有这个需要。

《记忆》的宗旨是三个面向：面向青年，面向业余，面向民间。《记忆》刊头上有四句话：汇聚研究成果，提供学术资讯，建立交流平台，推动文史研究。这四句话说的就是《记忆》的作用。从这六年的实践来看，《记忆》也确实给这个社会提供了一个说话的孔道，它也保存了历史资料，女附中文革专辑出了六期，加上以前出的有关文字，有六十万字。其中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是由《记忆》发表的，一旦发表，它就没法消灭，也没法封锁。研究文革，尤其是研究红卫兵运动、文革暴力、十七年教育的人，都需要检阅这些资料。如果没有《记忆》，这些资料就会流失。另外，《记忆》促进了学术研究。《记忆》要求首发，《记忆》发表的上百篇论文，学术水平不低，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国际一流。当然，这要感谢包括香港《二十一世纪》在内的刊物，因为他们的拒稿，才使这些高质量的稿子流向《记忆》。所以，我一直说《记忆》能办到这种程度，首先得感谢党，其次得感谢《二十一世纪》。

《记忆》没有自己的网站，它不谈政治，只谈学术，不谈主义，只讲问题。它是三五个素心人探讨学问，交流心得的地方。我从来没想把它做大做强，只想把它做久做长。

【书海泛舟】

内蒙文革第一枪

（《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选读）

启 之

按：本篇节选自作者长篇专著《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第三章，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1月初版。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报社夺权起纷争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革命”夺了市委的权，毛泽东称赞：“《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都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月9日和16日，毛泽东通过《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向全国造反派发出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



中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是毛泽东利用国家机器以文化暴力的形式将其“新理论”——反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党组织不等于反党¹——从文教界推向全国的序幕，也是造反派走上政治舞台，与保守派/军区发生冲突，从而导致大规模的直接性暴力的开始。

毛泽东的号召使内蒙的造反派闻风而动。1月6日《乌兰察布报》社的权力被夺，报名改为《重要新闻》。1月11日《内蒙古日报》社的大印易主，报名暂定为《东方红电讯》。夺权派是报社内部的造反派，与“呼三司”、“8·18”、“党委红旗”声气相通。他们于23日出版了第一号新《内蒙古日报》。

1月22日下午4时50分，二十余辆大卡车、大轿车停在报社门前。千余名“红卫军”、“工农兵”在报社内的保守派接应下，涌进报社。一群人冲进轮转车间，拆下轮转机的大牙轮，撕碎机架上的卷纸筒，砸坏铅版、油嘴，烧毁变压器，刚刚印出的新报被踩到脚下。另一群人冲进汉文车间，撕破门帘、推翻字架、砸坏桌椅、撬開箱柜、抢走铅字。播音室和夜班室同时遭劫，生产线上的工人与下厂劳动的学生被打，三名十五中的女生被撞倒，来人从她们身上踩过……“这次

¹ 关于毛泽东的“新理论”，是何蜀先生在《论造反派》（电子版）一文中提出来的。何蜀认为：“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兴起和发展，有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个历史条件，可以简单概括为‘一个新理论，两个大动作’。一个新理论，即反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党组织不等于反党”。

袭击的目的是要‘接管报社’，‘夺报社的权’。”¹全市造反派闻讯赶来，工学院“井冈山”一马当先，报社内外一下子又多了几千人。造反派围住保守派，舌战、打人、砸车，文武双全。保守派寡不敌众，纷纷逃遁。造反派扣下汽车、抓住“铁杆”、驱散余众，重新夺回了报社的权。

六个小时的军管

子夜，正当造反派庆贺胜利之际，一连全副武装的军人急驰而来，带队的是内蒙军区群众工作部副部长高碧。军队一进印刷厂即宣布了三决定：1，对报社实行军事接管。2，清理报社人员。3，出不了报以后再研究。²报社的三个门全站上了枪上刺刀的士兵，许进不许出。报社内部的保守派立即挂出巨幅标语：“坚决拥护解放军接管报社！”。造反派怒不可遏，纷纷上前质问：“为什么军管？”“奉谁的命令？”高碧答复：“我们奉军区的命令而来，军事接管就是军事占领，一切听从军区的指挥。”³

然而，六个小时之后，军区的命令作废，军队全部撤离，“军事占领”昙花一现。内蒙军区为什么要军管报社，为什么又要匆忙撤离呢？

第一，军区的消息来自保守派。是日晚6时许，从现场逃离的“红卫军”和“工农兵”的头头，到军区求援，晚11时黄厚副司令员接见。这些残兵败将向亲人解放军大诉其苦：我们“人员被打、宣传车被砸，还落了个破坏生产的名义。军区今天的行动太软弱了，要求黄副司令员一定给我们撑腰。”⁴军区党委认为情况严重，决定请示军委。

第二，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回电指示：“一定要调查清楚情况，情况不明，不宜轻易表态。要站在革命左派一边。军队不得动武，可以出面调解。”⁵根据这一指示，军区党委命令高碧到报社之前，先到市政协大楼（工农兵总部）了解情况。但是高碧在那里听到的还是一面之辞。随后，他来到报社，现场一片混乱。“调查清楚”根本不可能。“革命左派”又无任何外在的标志，这位副部长决定“先斩后奏”——“把部队都带进了报社”。⁶

第三，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

¹ 《“一·二二”事件的真相》，1967年6月24日《红色战士》。

² 呼市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印发《“一·二二报社事件”真相》，《关于“报社事件”和所谓“冲击军区”“夺军权”问题的真相》第4页。（辟谣选编之一）1967年6月28日。

³ ×××、××：《我们所知道的“一·二二事件”，1967年6月30日《红色战士》。

⁴ 《披着羊皮的一只饿狼——黄×反党活动的大事记》（见1967年1月22日），1967年7月15日《红色战士》。参见××××：《看，黄×在军区南门接待室与红卫军头目的一次表演》，1967年6月30日《红色战士》。

⁵ 徐向前的指示转引自《罪恶累累 铁证如山——王××反党活动大事记》，1967年7月15日《红色战士》。

⁶ ×××、××：《我们所知道的“一·二二事件”，1967年6月30日《红色战士》。

文件——《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个决定的出笼源于毛泽东对安徽问题的批示。毛指示林彪：“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什么是“革命左派”，他们的对立面是些什么人？革命左派与军队的关系怎样？如果革命左派冲击了军区，是照《军委八条》办呢？还是照这个《支左决定》办？如此等等，毛泽东均不屑一顾，完全处在自以为是的幻想之中。他以为革命左派与人民军队应该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事实恰恰相反。

军区当然愿意支持革命左派。问题是，“革命左派”在中共中央的文件、指示中是一个模糊含混、可以做多种理解的概念。军区心目中的左派与中央心目中的左派完全是两回事。从理论上讲，没有一个军区愿意支持保守派。但是在观念、出身和政治面貌上，他们和保守派是天然盟友。军队是党的工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当然要支持那些维护现存秩序的保守组织。而那些主要来自农村、通过政审入伍当兵的贫下中农子弟，显然更容易接受“阶级斗争”、“四个第一”等极左观念和愚忠思想，也更习惯用成份、出身、政治面貌以及对党和军队的态度来衡量群众组织。在这两方面，保守派都符合军区的要求。他们一心忠于毛主席，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大多数人出身、成分、政治面貌都符合时代标准，因此，军区心目中的“革命左派”只能是保守派。“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我了解，都是下层干部，成份比较纯，听话，抓革命，促生产，是革命左派组织，我坚决支持‘工农兵’，不支持三司。”¹

黄厚的这番表态，说明了军区支持谁、反对谁的基本标准。长期的阶级教育、左倾的思想灌输使军队与保守派结成了神圣同盟。军区只能相信保守派，只能听他们的一面之辞，只能把屁股坐在他们的板凳上。

1月23日6时，造反派把军区副政委刘昌请到报社辩论。刘昌再三解释：这次行动是“来保卫工厂”，“怕发生冲突”。并立即下令撤兵。²

撤兵并不意味着事情的结束，而是意味着一连串事件的开始。

对于造反派来说，“1·22事件”是军区支持保守派的证据。对于军区来说，这件事成了他们介入地方，卷入派性的契机。由此引发的两派冲突和军民对抗的事件接踵而来——1·25、1·27、1·29、1·31、2·3、2·4直至2·5军区开枪杀人，迫使中央出面干涉为止。在这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每一天都成了纪念日，每一天都有血案发生，每一个夜晚都是不眠之夜。

¹ 《披着羊皮的一只饿狼——黄×反党活动的大事记》（见1967年1月22日）。

² 呼市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印发《“一·二二报社事件”真相》，《关于“报社事件”和所谓“冲击军区”“夺军权”问题的真相》第5页。（辟谣选编之一）1967年6月28日。

从辩论到绝食

让我们从撤兵后说起。

兵撤了，刘昌却被造反派围住辩论。23日上午10时左右，保守派渐渐增多；为安全起见，造反派将刘昌带到内蒙古师范学院“东纵”会议室。十三个造反派组织和清华“井冈山”的代表把刘昌围在中央，要他承认三个结论：1、军管名为“保护机器”，其实并没保护。2、军区支持了保守派，打击了造反派。3、错误性质是军区与保守势力相勾结，镇压革命群众，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昌此时又累又饿，口干舌燥，不得不承认：此次行动没有调查研究，没有依靠报社内部的革命同志，没有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办事，犯了错误，愿意接受同志们的批判。造反派不依不饶，非要刘昌承认这是镇压革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可。刘昌只好说：“这次派军队，在客观上，实际上是从精神上镇压了革命造反派，犯了政治立场错误。”¹

于是造反派决定：1、成立调查组，弄清事件真相。2、责令军区负责人 24日下午2时到报社做检查。²

1月23日晚，参谋长王良太主动到内蒙古师范学院做检查，但是他的诚恳检查得到的却是“狡猾抵赖，企图蒙混过关”的评价。³与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乌兰夫在“前门饭店会议”上的遭遇一样，内蒙古军方的任何检查都满足不了造反派的要求，军区的头头们终于领悟到，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检查——批斗——再检查——再批斗，直至搞臭、打倒；要么停止检查，以观其变。

1月24日下午，内蒙古军区党委开会，黄厚、王良太、刘昌、张德贵、王勇成、蒋文奇等人统一了认识，做出两项决定：1、暂不检查，因为真相不明。2、出兵、军管、撤兵都是正确的，是为了保护报社和工厂，并没有支持哪一派。因此，军区方面拒绝了造反派24日下午2时到报社做检查的要求。⁴

在报社白等了一下午的造反派被激怒了，他们一面派人找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一面调集人马到内蒙古军区找刘昌算账。1月25日上午，造反派的宣传车到军区南门外宣传，军区用高音喇叭干扰。造反派棋高一着，改播中央文革小组的支左决定，军区广播车哑口无言。不一会儿，军区来人请造反派的广播员和两个贴大字报的学生到军区礼堂辩论。在那里，三个人被推搡、辱骂、倒剪双臂照

¹ 《蛇一样的恶人——刘×反党活动大事记》（见1967年1月23日），1967年7月22日《红色战士》。

² 呼市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印发《“一·二二报社事件”真相》，《关于“报社事件”和所谓“冲击军区”“夺军权”问题的真相》第6页。（辟谣选编之一）1967年6月28日。

³ 本报评论员：《反党篡军的野心家阴谋家——反党集团头目王××反党罪行》，1967年9月26日《红色战士》。

⁴ 《罪恶累累 铁证如山——王××反党活动大事记》（见1967年1月24日），1967年7月15日《红色战士》。

相。保守派在外面乘火打劫，围攻造反派的宣传车。各路造反派闻讯赶来，内蒙古师范学院的“东纵”到了军区西门，内蒙古工学院的“井冈山”到了军区北门。

师院“东纵”被拦阻门外；工学院“井冈山”的39名战士则列队跑步闯进军区。院内严阵以待的200余士兵立即将其团团围住。双方展开语录大战。“井冈山”大念毛主席语录，士兵们则高唱毛主席语录歌，“井冈山”跟着唱，士兵们马上停止。“井冈山”再念语录，士兵们再唱语录歌。军区文工团中的造反组织“红色造反团”加入“井冈山”的队伍为其助威……

双方都声嘶力竭之后，终于达成协议——“派代表解决问题”。¹双方代表来到军区小礼堂，展开辩论。这时西门外的“东纵”也冲进军区与“井冈山”会师。士兵也增加了一、二百众，尽管刘昌出面接见，辩论仍变成对骂。造反派人少力单却气壮如牛，辩论到了子夜，造反派留下33名代表坚守阵地，其余撤离。坚守者身陷重围，在紧张、亢奋、饥寒交迫之中更加思念伟大领袖。一个女学生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当时的流行歌曲：“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黑夜里想您有方向，迷路时想您心里明……”歌声马上响成一片，它低沉、悲壮，伴着泪水，伴着呜咽。

1月26日天明，辩论重新开始，如果不是2月5日那两声枪响，这种马拉松式的辩论还将继续下去。从1月26日到2月2日这一周的时间里，军区内外又发生了好几件事。

1月27日上午，军区文工团造反派组织“红色造反团”成员王建萍、韩文达挤进礼堂，向学生们表示慰问，遭到军人们的辱骂、围攻。学生们组成人墙将王、韩保护起来。俄顷，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一个瘦长脸的中年军官步入礼堂，向众人宣布：“决定给王建萍以行政看守处分。”军人们一拥而上，将这位勇敢的女性从人墙中揪了出来，随后投入监牢。²王建萍是被内蒙古军区关押的第一个军人，是第一个被处分的军内造反派。

1月30日，工学院“东方红”给军区送来了大字报，“并提出三点要求：要刘昌出来辩论。2、保证军区少数派的人身安全和出来串联的自由。3、允许我们进去贴大字报。”³军区不予理睬。

1月31日凌晨，工学院造反派二百余人在军区招待所与军人辩论，指责军人殴打造反派。军区派出六辆卡车，满载军人前往助战。同日，哈军工、上海二医大赴内蒙古点火的造反派被军人围打。⁴军区管理局营房科的一个战士向人们

¹呼市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印发《“一·二五宣传车事件”和所谓“冲击军区”的真相》，《关于“报社事件”和所谓“冲击军区”“夺军权”问题的真相》第11页。（辟谣选编之一）1967年6月28日。

²《反党集团镇压军内革命造反派的开场白——关于“一·二七事件的真相”，1967年7月8日《红色战士》。

³呼市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印发《关于“报社事件”和所谓“冲击军区”“夺军权”问题的真相》第15页。（辟谣选编之一）1967年6月28日。

⁴《一·三一事件的真相》，1967年7月20日《红色战士》。

夸耀：“（我）一个耳光打上去，把上海二医大的一个学生的眼镜打坏了，玻璃片子都扎到脸上。”¹“上述一系列事件引起了全市造反派的愤慨……为叫刘昌出来见群众”，造反派们“进行了静坐示威。这一行动得到了呼市广大造反派的支持，由开始的师院‘东纵’、工学院‘井冈山’、‘东方红’几个单位扩大到三十七个单位。然而刘昌等一小撮人仍不出面。”“于是，工学院‘东方红’、‘红旗’共六十人举行了绝食斗争。”²

此后的几天，军区党委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大批清洗“吃里扒外”的内部造反派。2月1至3日，“红色造反团”办公室、宿舍三次被砸，造反派被打，重伤四人——一卫校女兵昏迷不醒，三名女文工团员，一脑震荡，一腹部被踢伤，一眼睛被打坏。造反团当即举行集会，向闻风而至的各路造反派公布军区罪状。军区派人包围了会场，造反派急忙转移，不料车被堵住无法开动，突围之中许多人遭到殴打，一些人被捕，跑出去的人或转入地下伺机而动，或逃往北京向党中央求救。军区方面则将其同情者和亲属严密监视。一夜之间，军区内部的反叛者被扫荡干净，其巢穴被抄，设备被砸，材料被抢。³

再说区党委方面，党委一班人此时一面应付日常工作，一面随时准备被对立面揪斗。报社事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生产领导小组组长李质打电话给军区，要求军区采取主动，揪出根子。不久，李质、高锦明又到军区调解。但谁也不听他们的。军区方面认为，他们是压迫军区支持呼三司，是想利用造反派夺军区的权。军区方面随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

——各单位人员严守岗位，昼夜值班，进入战备状态。

——将集体收存的枪支弹药，全部发还个人，没有武装的工兵、测绘队员、退休干部也一律武装起来。

——作战部增派两个连加强后勤部和司令部的保卫工作，军区院内设三道岗：门口、花池、楼门各一道。

——调集4931、4925、4754等部队的五个连向呼和浩特市秘密集结。

——动用驻呼部队中的五个连，接管重点单位（如，呼铁局大楼、电力厂、党委等）。

——组织十一辆宣传车上街宣传。

——组织政治部人员到待命的部队进行反呼三司的宣传工作。

——向各盟市军分区发文，进行形势教育。大量印发宣传品，介绍呼三司反党乱军的罪行。指示保守组织派人到全国各地说明“真相”。

¹ 侯凤英：《我的控诉》，1967年7月30日《红色战士》。

² 《揭穿军区对“静坐示威”和“绝食”斗争的歪曲》，呼市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印发《关于“报社事件”和所谓“冲击军区”“夺军权”问题的真相》第15页。（辟谣选编之一）1967年6月28日。

³ 陈树键：《我在审判》，载1967年7月30日《红色战士》。

最有趣的是，驻呼某连1月28日突然接到王良太的电话：“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高锦明畏罪逃跑”，命令我连“分两路分别到白塔车站、京包公路去截车”。“我们一夜也没有休息，见车就拦住，翻他个底朝天，结果根本没有见到高锦明。”事实上，高锦明那天正在呼市游街挨斗，斗他的恰恰是呼三司。1月29日，该连又接到军区命令：“呼三司满载一汽车武器，已出呼市，要运往大青山。”“命令我连马上紧急集合，跑步到公路上去拦车。人人都把子弹推上了膛，准备进行战斗。等了一个下午，结果仍然是连一个汽车的影子都没有看到。”¹

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的造反派们在这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当然不会袖手旁观。“1·22 报社事件”甫毕，其造反组织“长缨战斗队”即以《内蒙古军区竟敢违背中央指示，出动武装部队镇压革命群众》为题，写成文章报到中央文革。1月27日，此文载入中央文革《快报》，并由林彪批转，通报各大军区。此举对内蒙古军区不啻当头一棒，见到《快报》之后，军区即召开常委会研究对策。会议认为：“《快报》没有以中央名义发，中央不了解情况，毛主席听了一面之辞，咱们不管它。”²会后，军区党委回电中央军委：“对有关情况有不同意见，即将派人详细汇报。”³

两天后，军区领导思前想后，觉得还是不得罪中央文革，检讨一下为妙。于是再次致电军委，大意是：“（报社出兵）组织不严、不细，对善后工作的安排认识不足，后果不好，在群众中产生了不良影响。”⁴

《快报》发出的第三天，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德贵带着各种材料赴京。这些材料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呼三司等造反组织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领导高锦明、权星垣、李质等人的罪状。材料中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两派的观点、政治背景、阶级成份等情况。军区郑重地向军委指出：“呼三司”、“8·18”等造反派组织反党乱军、死保高锦明、权星垣、李质等乌兰夫黑帮，维护资反路线，其队伍政治成份复杂，混入了各种阶级异己分子，其成员60%出身于地、富、反、坏、右，人数不多，能量很大，不得人心。受高、权、李等人操纵，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组织。“红卫军”、“工农兵”、“无产者”等群众组织队伍纯洁，由工、农、复转军人、下层干部组成。出身好，服从领导，人数众多，深得人心，是革命左派组织。

如果说1月27日的中央文革《快报》令内蒙古军区领导大伤其心，那么第二天发来的《军委八条》则令其大受鼓舞。《八条》由林彪口授，其中充满了“不许”、“不准”、“不得”一类的否定式规定，最让军区欣慰的是第一条和第五条。

¹ 杜万秀（战士）：《黄、王反党集团蒙蔽战士一例》，1967年8月9日《红色战士》。

² 秦学：《黄王刘张反党集团是革命人民的死敌》，1967年8月11日《红色战士》。

³ 《蛇一样的恶人——刘×反党活动大事记》（见1967年1月28日），1967年7月22日《红色战士》。

⁴ 《罪恶累累 铁证如山——王××反党活动大事记》（见1967年1月29日），1967年7月15日《红色战士》。

第一条规定：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第五条规定：即使是左派，今后也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

整个事情就像一个战役——造反派夺了报社的权，占领了宣传阵地。保守派采取“闪电战”夺回了报社的权，造反派损失惨重，败下阵来。军区出兵，军管报社，巩固了保守派的阵地。造反派以“辩论”为武器，向军区讨说法，意在重新夺回报社。这“辩论”听起来稀松平常，实际上威力无比，它意味着不依不饶、软硬不吃、吹毛求疵、无限上纲。对此军区应之以重兵，待之以严阵，以强凌弱，以众暴寡。造反派见无法取胜，遂大举哀兵。

2月2日晚9时，工学院《东方红》、《红旗》60人开始绝食，绝食指挥部向军区宣布了七项要求，大意是：1、刘昌当众检查，承认错误，支持革命派。2、答应呼三司、上海二医大等一切革命组织的要求。3、保护军区内部的造反派，恢复其自由。4、严肃处理污蔑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和打人凶手。5、当天十二时之前张贴出送去的大字报。6、执行军委八条。7、上述各条，必须及时答复，否则后果由刘昌等一小撮负责。¹

绝食一宣布，立即得到各造反组织的支持和响应。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自治区党校、内蒙古体委、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内蒙古交通学校等单位的造反派纷纷加入绝食队伍，原来的60人迅速增加到139人，其中22人是女性。一百多个单位纷纷来到绝食现场——军区招待所慰问，医院派大夫照料处理，记者呼吁军区重视学生的要求。北京、上海的造反组织驰电声援，一位战斗英雄把自己在朝鲜战场上获得的奖状赠予绝食指挥部，内蒙古机床厂的工人陈××含着眼泪说：“我听说同学们绝食斗争，一下班就来了。同学们对毛主席这样热爱，使我实在感动，我死也要和你们死在一起。”²一铁路工人杨×说：“我入党二十多年，你们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顾自己的生命，我坚决支持你们，真理在你们这一边。”³

军区戒急用忍，以不变应万变，不为绝食所动。

军区开枪了

2月4日晚6时，在静坐64小时之后，各造反派组织组成“见刘昌百人代表团”要见刘昌，限十分钟答复，军区不理。代表团举旗列队进入军区大院，刚进门二十多米，两侧即冲出数百名武装军人，将队伍冲成几段。“采取两三个围

¹《揭穿军区对“静坐示威”和“绝食”斗争的歪曲》，呼市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印发《关于“报社事件”和所谓“冲击军区”“夺军权”问题的真相》第16页。（辟谣选编之一）1967年6月28日。

²同上。

³同上第15页。

打一人手段，把代表们推倒，拳打脚踢，有的抓住女同志的头发，硬往地上拖；有的夺过代表团的旗杆子打人，有的用皮带抽人，有的用枪托猛击被打倒的同志，有的抓起被打倒同志的手脚往大门外扔。他们把军区的家属小孩也叫来围攻代表团，给代表们扬沙土、扔石头。更甚者，几个彪形大汉追打一个女同学，连续打倒三次，直到打昏死后才罢休。对另一男同学由两个人抓着头发，反扭双手，边抽耳光，拉到室内，进行拷打审讯……并拍照后推出门外。”¹ “反革命”、“不拿枪的敌人”、“中国人民的败类”等斥骂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呼喊交织在一起。

“百人代表团”被打散了。第二、三、四批代表被押到办公室里，楼门口和每层楼的楼梯上都站着全副武装的官兵，每进一道门，每上一层楼，代表们都挨一顿打，直到被关进临时布置的审讯室。审讯其实只有两句话：交出头头来！谁是你们的黑后台？代表们个个大义凛然，以高唱《国际歌》，高呼“毛主席万岁”来回答军人们的审问。军人们恼羞成怒，架起机枪。²

这种只能在新中国的电影中看到的场面被新中国的政治放大了千万倍在新中国的大地上导演出来。不同的是，电影中敌对的双方不是国共两党或中日两国。此时此刻的演员全是为毛主席而战的同胞。“据不完全统计，至4日深夜二时截止，从军区大院抬出送往医院的重伤代表就近二十人。”³

“这天夜里，架着机枪的三轮摩托车在街上来回奔跑”，⁴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响到天明，保守派到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武装部队枕戈待旦，重要机关门口已站上了武装军人。刺刀在路灯、车灯的照耀下闪着幽冷的光。内蒙古首府笼罩在恐怖和疯狂之中。

第二天，1967年2月5日清晨，受到重创的造反派重整队伍聚到了军区门口，小露锋芒的军区森严壁垒，一片死寂。上午10时，军区向造反派颁布了三条命令，要求其撤离门口，否则后果自负。数百名呼三司、河西公司“8·18”的造反派不以为然，仍旧在门外鼓噪。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学生拿着半导体扩音器，带领大家高呼口号：“强烈要求军区检查错误！”“刘昌不投降就让他灭亡！”“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军区里一片沉寂，堵在门口的两辆军用卡车已经撤离，门口站岗的卫兵也无影无踪。持枪荷弹的士兵无声无息地蜷缩在楼前的临时工事里，只有主楼顶上的机枪手偶尔发出一两声轻咳。

这不祥的沉寂引起了河西公司“8·18”的警惕，他们大都当过兵，经验告诉他们，今天军区很可能要采取行动。为了保护呼三司学生的安全，他们从静坐

¹ 《二·四事件的真相》，出处同上，第21页。

² 同上，第21—22页。

³ 《韩桐事件真相》出处同上，第22页。

⁴ 同上，第22页。

队伍的后面，悄悄往前面移动。

中午 12 时许，一名军官从楼里走出，左手里拿着大衣，右手插在裤兜里。他径直走到大门口，朝那个带头喊口号的青年学生喝道：

“不许胡喊，这是军区！”

青年：“就喊！”

军官：“再喊，就毙了你！”

青年：“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军官突然从裤兜里抽出手枪，“砰！砰！”两声枪响，青年应声倒地，鲜血从胸前汨汨涌出。门外顿时乱成一团，“军区开枪了！”“打死人了！”呼三司的小将们奋臂挺胸要往里冲。

主楼里，“准备战斗！”的命令沿着楼梯往下传递，埋伏在军区内的战士精神一振，临时工事里一阵激动，枪上膛、刀出鞘，摩拳擦掌准备收拾这帮不知死活的学生。楼顶上，黑洞洞的机枪口对准了南门外。开枪的军官右手插在裤兜里，若无其事地走进主楼。

南门外，河西公司的造反派拉起手来，一齐后退，拦住向前涌动的人群，同时向人们高喊：“决不能跨进军区一步，千万别上当！”¹ 愤怒的人们止住脚步，军区主楼里传出一阵沮丧的咒骂声。²

这是震动内蒙古，影响全国，以至引起外蒙关注的“二·五韩桐事件”中最精彩的一幕。

三个小时后，那位青年实践了自己的誓言。医生从他的肺部取出一颗九零式手枪子弹。诊断结果：子弹打穿肺动脉，失血过多，死亡。

时间：1967 年 2 月 5 日中午 12 时 15 分许。

死者：韩桐，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四年级学生，托克托县人，呼三司战士。

开枪杀人者：柳青，内蒙古军区军训部副部长。

这是文革中人民解放军向学生开的第一枪。

这一枪是一个标志，就北京而言，它标志着文革的第一次失控和毛泽东进一步失误。失控是失误的结果——毛泽东不知道，经过十七年的高压，中国社会积蓄了何等巨大的反体制、反秩序的能量；不知道这种能量只能以变相的形式和扭

¹ 《二·五事件的真相》，1967 年 7 月 20 日《红色战士》。

² 关于“二·五韩桐事件”，《康生与‘内人党’冤案》一书的说法是：“军区南门外‘呼三司纠集几千人马’，‘当时，内蒙军区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柳青出入司令部作战值班室，见到军区与北京总部之间电报往还，以为开枪的请示即刻将被批准。他提上自己的五九式手枪，挎上马刀……走近前，挥刀便砍，韩桐闪身躲过，柳青随即举枪，对准韩桐扣动扳机。”（见该书第 32 页）。这一说法在三方面有误：第一，柳青开枪并非个人行动，而是军区授意。第二，当时在军区门口静坐的造反派人数没有几千之众。第三，并没有柳青“挥刀便砍”“韩桐闪身躲过”等戏剧性情节。见《高树华采访记录》、《二·五事件的真相》（载 1967 年 7 月 20 日《红色战士》）及 1967 年 2 月 8 日《文革简讯》。

曲的管道释放出来；而这些能量的形成完全是社会心理长期被扭曲压抑，群体情绪极度紧张的结果。

同时，这一枪也标志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思想混乱和矛盾——既要天下大乱，又要让军队井然有序。既让军队支左，又让军队超然物外。既让军队纵火，又让军队消防。性质决定了任务，任务造成了它的尴尬处境。

就内蒙古而言，这一枪标志着两派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标志着内蒙古军区“全力对付北京”（军区参谋长王良太语）的开始。另一方面，这一枪也是一个分界线，在它的前面是报社夺权、军民相斗等一系列事件，在它的后面是周恩来的调停，中央的决定和保守派的殊死搏斗。

柳青开枪确是军区的阴谋。事后，看守“呼三司”的一名军人对被捕者说：“我们真佩服你们的策略，打死韩桐那天，你们不冲，如果冲的话，机关枪一突突，两千个也死了。”另一个军人纠正道：“甭说两千，就是三千也玩儿完。”（李景荣（呼三司第一师范五十七班）：《浩歌正气迎逆风，英勇无畏战恶浪》，1967年8月25日《红色战士》）这话并非夸张。半个月后在北京谈判时，军区副司令黄厚悔恨交集：“当初呼三司冲军区时，一切都准备好了，我如果再坚持一下就好了，决心就下了，就可以把他们一下子干掉，就不会有今天的麻烦了。”（《披着羊皮的一只饿狼——黄×反党活动的大事记》，1967年7月15日《红色战士》）军区领导原以为一开枪，呼三司肯定会往里冲，一冲就可以按《军委八条》办事——杀一批、抓一批。

这些与国民党、日本兵周旋了大半辈子的将军们万万没想到，他们居然输在一群乳臭未干的学生手中。他们更没想到，《军委八条》非但不是保护伞，反而成了陷人以罪的诱饵。

【书海泛舟】

《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后记

启 之

按：启之著《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1949～1966年）》，由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0年4月出版。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常常想起明末的三大儒——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从这些先贤又想到五七年的右派，想到这本书里写到的电影人。

明亡之后，顾亭林遍游华北，学问赅博，却坚辞清廷明史馆的高位。王夫之

甯身瑶洞，伏处深山，竟潜心著述垂四十年。黄宗羲隐居故里，讲学著述，而屡拒清廷博学鸿辞科的征召。此三人分明知道，自己的呕心沥血之作在活着的时候绝无问世的希望。他们为什么要甘居草野，而不去“曲线救国”——先当上官，取得话语权，再徐图发展？为什么要不识时务，写那些无法付梓的文字——学问总会有人作，留给后人又有何不可？他们图什么呢？

私心以为，顾、王、黄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有历史感、有使命感，有对学术的忠诚，有对言说的自信。他们知道，世道会变，实事求是之说，经世致用之学在时间的汰洗下，迟早会现出光辉。他们知道，屁股决定脑袋，当上了清朝的官，就会像徐乾学一样，成为御用文人，其话语权就只能在为当局歌功颂德的《大清一统志》中派上用场。“徐图发展”云



云不过是求取荣达富贵的遮羞布。他们知道，值此“天崩地解”之时，一介书生，只能以无用之身行有用之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使命鞭策着他们，使他们坚信求真的思想是民族的灵魂，求实的学问足以明道淑世。真理需要探索，学问有待积累。把这些事情留给后人是他们这代人的失职，是吴伟业、侯方域、陈名夏一类士人依附主流的借口。正是这种对历史的认知，对使命的承担，使他们拒绝了“俊杰”的诱惑，变成了不识时务的异端。正是这种忠诚和自信，使他们选择了凶险艰难的人生，走上了远避主流，不求荣达的道路。

二百多年后，坚守得到了回报——他们以傲人的铁骨、终生的困顿、二百年的寂寞为中国的思想学术建立了丰碑，我们有了《日知录》，有了《船山遗书》，有了《明儒学案》。

想起这三位先贤，是因为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也分明知道它无法在大陆问世。叩问他们之所图，实际上也是在反问自己。我无法与这些先贤相比——顾、王、黄是有多方建树的鸿儒，我是一无所成的书生；他们有亡国之痛、离乱之悲，我生在红旗下活在小康中。他们有绍续文化传统之心，而在我看来，这个以极权主义为核心的文化传统必须彻底抛弃。亭林讲的是亡国、亡天下，船山讲的是气、理，梨洲讲的是君、臣。我讲的是新中国的电影。他们之所图，是“实事求是”，是“经世致用”，是“发抒志意，昭示来兹”。我之所图是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挖出影界之病根，以促进思想、制度之变革。如果说我与他们还有一点相通的话，

那就是说真话。毛泽东坚信，人性只有具体的，没有抽象的。那末，说真话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

说真话是实事求是的前提，但是有了这个前提并不等于实事求是。在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次文艺整风中，从上海过来的电影人真诚地检讨自己的小资思想，诚恳地否定过去的创作。他们说的是真话，可这些真话反映的却是假的事实。五七年反右以后，电影人学会了说违心的假话。可以说，新中国的电影人在十七年中经历了两个时代——无意“造假”的时代与有意“造假”的时代。

说假话没有真学术，说假话会有真现实吗？十七年电影的最大特点就是远离当时的真实生活，这与电影人的心灵没有关系吗？人们常说，学艺先学做人。如果一个艺术群体整天在“假、大、空”中搞创作，会有多少现实主义？

“个体是历史的人质”。倘若我生活在思想一元的时代，会和当年电影人一样，在假话中虚度人生，将心血奉献给空想的政治。可是，当我有幸生活在“以人为本”的太平盛世，著述于“有限多元”的“和谐社会”，为了出书、为了名利而去“造假”，那我就辜负了这个时代。上负先贤，下愧后人。

“要研究真问题，不要研究假问题；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要笃学力行，不要投机取巧。”这是我的“三要三不要”。

感谢台湾秀威出版人，他们帮助我完成了说真话的宿愿。与右派们相比，我是幸运的——说了真话而不至家破人亡；与先贤们相比，我也是幸运的——在活着的时候，看到了这本书的出版。

2005-3-27

【书海泛舟】

激进文艺思潮再起 (《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选读)

启 之

按：本篇选自《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1949～1966年）》一书第十六章。

文艺政策的由进而退，电影政策的由热转冷，“非主流”影片的主流化，标志着文艺调整的失败和激进主义的胜利。文艺调整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这种调整无法触动中国电影发展的根本障碍——“一体化”和“一元化”。激进主义之所以成为必然的趋势，则是因为在这一体制和思想的培育下，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的

锻炼，激进主义已经深入人心。

在国际上冷战加剧，中苏关系恶化，国内重提阶级斗争，大搞反修防修的背景下，从1962年下半年开始，激进文艺思潮卷土重来。以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为首的激进派，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意在否定30年代的文艺和建国后的文艺界，将文艺更加纯净化。尽管周恩来、邓小平、周扬、林默涵等人对这个口号进行了抵制，但是，由于毛泽东的支持，务实派节节败退。¹ 电影创作也因此出现了重大的变化。

1963年底和1964年中，毛泽东发出的两个批示，对建国后的文艺界做了全盘否定。激进主义以文艺界为突破口，旨在清洗文艺领导层，重建阶级队伍，更新国家意识形态。文化部因此进行了文艺整风，夏衍、陈荒煤被认为执行了资产阶级错误路线而遭罢黜。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更激进、更彻底的思想文化批判运动。电影界第三次成为重点，《早春二月》、《北国江南》、《不夜城》、《林家铺子》等影片被认为宣传了“修正主义”而遭到批判。第三波“非主流”由此而生。

文艺整风与文化批判使电影界再次陷入了突出政治、狠抓阶级斗争的泥淖之中，“大跃进”时期兴起的“三结合”的创作方式重新登场，沉寂不久的“纪录性艺术片”以新的名目重现出现。阶级斗争、好人好事成为电影创作的基本内容。与此同时，激进主义文艺思潮以戏剧为突破口，“加速了1963年后戏剧舞台的政治化或中心化的步伐”。² 文坛上的这一变化使所谓“现代戏艺术片”骤然增加。³而江青则借着京剧现代戏的全国汇演走上了政治舞台，拍摄“样板电影”，树立“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已经列入以江青为首的激进文艺派的议事日程。⁴1966年初，“林彪委托”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中央文件的形式，确立了激进文艺的统治地位，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文化上已经准备就绪。

第一节 反修防修：“大写十三年”

¹ 徐桑楚在自传中提到了一件事，可以作为毛泽东对务实派的态度的一個证明：1962年春，广州会议之后不久，上海电影局安排他向局属系统的400多干部职工传达周恩来在新侨会议上的讲话，陈毅和陶铸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会议开始后，我预备先传达周总理的讲话精神。刚开始还不到十分钟，蔡贲突然来到会场，不由分说地打断了我，并宣布终止会议。一时间台下议论纷纷。我也忍不住多问了他一句：到底怎么回事？蔡贲把我拉到一边，低声对我说，市委来了电话，据说主席对这几个讲话内容有不同看法，所以市里决定暂不传达。”见石川编著《徐桑楚口述自传》，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第172页。

² 陈顺馨：《1962：夹缝中的生存》第11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

³ 这是陈荒煤主编的《当代中国电影》（上册）中的提法。见31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

⁴ 1964年，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创作演出的多幕话剧《南海长城》奉调进北京演出，6月19日，毛泽东与江青观看了演出。毛肯定该剧。1965年八一厂拟将此剧搬上银幕，指定严寄洲任导演。“江青一直有拍样板电影的念头，当她获悉八一厂要根据《南海长城》拍成电影”，遂自任此片的艺术指导。1965年7月19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见总政文化部陈亚丁副部长、陈播厂长和严寄洲等人。江青讲了“很长时间如何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话（那时还没有发明‘三突出’一词），要形象高大，对剧本修改和剧情的安排都要以此为中心”等等。详见严寄洲：《往事如烟——严寄洲自传》，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第85页。

1962年9月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大反“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1962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华东省市委书记谈话，批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提出“东风要占优势”，他向与会者提出问题：“对修正主义有办法没有？”并指示他们“要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看戏。”¹在这次谈话中，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上海市市长的柯庆施是最重要的参加者。

10天后，1963年1月1日，柯庆施拿出了对付修正主义的办法——“大写十三年”（即1949年10月到1963年1月）。1月6日，在上海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柯庆施将这一办法变成了指导文艺创作的口号。如果说，这个办法是“立”的话，那么，同年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柯庆施提出的则是“破”——作为华东局代表的柯庆施发言强调：“电影、戏剧中现代的、革命的题材太少了，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妖魔鬼怪的题材太多了，外国的、香港的也不少。已经有些喧宾夺主、泛滥成灾的味道，应该采取解决的措施。”² 尽管这个“破”不过是毛泽东晚年文艺思想的发挥，但是它所起的作用却是双重的——既呼应了毛泽东的上次谈话，又找到了“大写十三年”的理由。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张春桥闻风而动，很快为这一说法提供了十大好处。“从这个时候开始，极左思潮在中国的政治生活逐渐开始抬头（原文如此——本书作者），并且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文艺界的形势也开始由正常出现扭曲。”³

令人诧异的是，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尽管这种提法遭到党内高层和电影界领导的一再且一致的反对，但是上海方面却坚持己见，态度极其强硬。对这一反常的现象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柯庆施等人从毛泽东的言论中嗅出了文艺的走向，将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的思想运用到了文艺创作领域。把柯庆施等人的这一行为仅仅看作是李林甫式的“迎合上意，以固其宠”的政治投机，未免简单片面。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制订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当时存在的‘左’倾思潮不是偶然的，不是个别人的责任，而是全党性的思想认识问题。”⁴ 换言之，柯庆施、张春桥等“上海帮”不过是党内激进主义的先行者，“大写

¹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第12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² 同上，第1266页。

³ 石川编著：《踏遍青山人未老——徐桑楚口述自传》，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第175页。

⁴ 关于“全党性的思想认识”，薄一波讲得比较充分。他说：“国际上，从1960年起，我们党认为苏联出了修正主义，考虑如何‘反修防修’问题甚多。1962年4、5月间，苏联直接插手酿成了新疆伊犁暴乱、塔城等三县边民外逃等事件，还暗中支持有的国家在我边界地区挑起冲突。我国海峡两岸局势也很紧张。蒋介石集团叫嚷要‘反攻大陆’。美国曾不断派遣间谍飞机侵犯我内陆（包括北京）领空。国内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比如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和严重经济、刑事犯罪活动等，表现得也比较激烈，更主要的是，毛主席把党内认识上的分歧也看成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毛主席强调阶级斗争，很快为全党所接受。从预备会议到八届十中全会，大家都发言表示拥护毛主席的观点，认为毛主席提出的这些问题，在长时期内，一直到消灭阶级都是管用的。”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第1137—1138页。

十三年”这种偏激、片面的文艺主张的提出，标志着政治激进主义已经成为党内高层的思想指南，并被自觉地运用到文艺领域。

按照柯庆施的阐释，“大写十三年”就是写活人，不写死人、古人，这样做是为了“厚今薄古”。他认为，只有写13年的现代生活，才能“帮助人民树立社会主义思想”，¹因此写不写13年就成了关系到是否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路线、方向问题。这种违背了《讲话》关于对待古今中外文化遗产的基本精神的说法的荒谬性是不言自明的，尽管自建国以来，文艺界接受的荒谬提法多多，但是，这一自我否定的提法却无法让以《讲话》为指南的文艺界理解和接受——它不但否定了一切历史，而且否定了建国前的中共革命史；不但否定了革命历史的意义，而且否定了1949年以后文艺界，尤其是电影界，为重构革命历史，为构建新政权合法性所做的工作。

这最后的否定是最有现实意义的，或者说，前面的否定就是为了这最后的否定——实际上，柯庆施等人正是要通过否定文艺界建国以来的工作，来突显自己的革命性和先进性。这些激进文艺派正是从题材选择之中发现了修正主义的苗头。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毛泽东产生了共鸣——毛泽东从“有鬼无害论”中发现了“农村、城市的阶级斗争”²，柯庆施们则从“写死人、古人”的创作中发现了“修正主义”。

“大写十三年”指的是写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是一个以时空为表，以政治为里的文艺概念。这个概念首先关涉到题材，笔者在本书的“导论”中谈到，17年的电影是题材规划的产物，政治需要将题材划分成若干等级。在这个等级序列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为民众提供信心，为政策提供合理性的现实题材；排在第二位的是为民众提供历史想象，为政权提供合法性的革命历史/战争题材；排在第三位的是为民众提供爱国主义，为国家意识形态提供证明的一般历史题材。“大跃进”强化了题材等级序列，将为现实服务的题材，如“纪录性艺术片”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60年代初，随着“大跃进”弊端的显现，原有的文艺秩序的恢复，革命历史/战争题材在重新受到重视的同时，现实题材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冷落。柯庆施的提法，实际上是“大跃进”时代激进文艺思潮的理论化和极端化，它以更激进的姿态，打破了原有的题材等级序列，取缔了除现实题材以外的所有的题材，现实题材成了唯一正确的、进步的、革命的选择。写十三年才能“帮助人民树立社会主义思想”，按照这种逻辑推论，写古人、写死人、写30年代就意味着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就是帮助人民树立非社会主义的、不革命或反革命的思想。这是赤裸裸的“题材决定论”。

¹ 陈荒煤主编《当代中国电影》上册，第282页。

² 1963年5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期间的讲话。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第1263页。

这种激进主义的题材观，并不是 60 年代才出现的，也并非柯庆施、张春桥的独创。它源远流长，有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它的始作俑者，正是被“上海帮”视为“异端”（文革中变成了“黑线”）的 30 年代左翼文艺。1931 年 11 月，左联通过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决议，规定革命文学只能写“反帝国主义”、“反军阀主义”、“苏维埃运动”、“白军剿共的反动罪恶”、“农村萧条和地主压迫”这五种题材。决议宣称“只有这样才是大众的，现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所必须取用的题材。”¹ 这种激进主义题材观在《讲话》中被理论化、系统化，虽然某些过于露骨的文字后来被删改，² 但其基本精神被毫无改变地贯彻到文艺工作的各个环节。1949 年以后，电影界所特有的题材等级、题材规划、题材比例即源于此。电影主管部门用题材规划来掌控每年的生产，编导把题材选择视为创作成败的关键。1956 年题材问题成为电影人鸣放的重点，1958 年拍摄什么样的题材则成了跃进与否的标志。总之，由题材产生的所有问题皆本乎此。

原中宣部文艺处干部黎之谈到：“50 年代曾提过各种各样‘为一个时期的任务服务’的口号。如‘为生产服务’、‘为土改服务’、‘为三反五反服务’……作家称为‘赶任务’。当时《文艺报》还就赶任务问题进行过讨论。”“三反五反时，薄一波到上海，满市都演‘三反五反’戏，他回京后特别告诉周扬，说全演这样的戏没人看。田汉的《十三陵水库畅想曲》，老舍的《春华秋实》、《红大院》恐怕也属于赶任务之作。”³ “赶任务”抬高了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政治地位，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打压不同意见：1950 年关于是否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论争，1951 年对第一次“非主流”——《武训传》、《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等非主流题材的批判，1953 年关于写英雄人物的讨论，1955 年对胡风批评的“题材主义”、“题材差别论”的讨伐；1957 年对第二次“非主流”影片——《花好月圆》、《情长谊深》、《球场风波》、《新局长到来之前》等表现人性、人情、批评现实等题材的整肃，以及 1958 年文艺界在“演中心、画中心、唱中心”面前的无奈。这一正一反的政治运动为激进主义的题材观，为柯庆施、张春桥们铺平了道路。1963 年特殊的历史语境，使它以“大写十三年”的形式，理直气壮地占领了话语中心。

显而易见，这种激进主义的题材观是以“文艺工具论”为前提的。“文艺工具论”的理论依据是早在四十年代就形成的、并在建国后不断充实发展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正是因为坚持这一理论，激进文艺思潮才有了

¹ 《文学运动史料选》（二）第 241 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年。

² 黎之在《文坛风云录》谈到，1953 年第三卷《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时，毛泽东对《讲话》作了许多修改。在（三）部分谈到文艺与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这一问题时删去“在有阶级有党的社会里，艺术既然服从阶级，服从党，当然就要服从阶级与党的政治要求，服从一定时期的一定革命任务。离开了这个，就离开了群众的根本需要。”“这段话虽然删去了，但对文艺与党的工作的片面理解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绝对化。”第 316 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

³ 《文坛风云录》，第 316 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

用武之地；也正是因为坚持这一理论，党内务实派才节节败退，无所依凭。那么，又是什么使这一理论贯彻始终，无可动摇呢？追根溯源，就在于本书导论提出的“一元化”思想和“一体化”体制。“一元化”从思想上敌视、排斥任何有异于这一理论的文艺观，“一体化”则从组织和物质上禁绝了异样思想的生成。

时至今日，仍有相当多的人们认为，是柯庆施、张春桥、江青等人的“极左”思潮影响了毛泽东，¹ 事实上是毛泽东诱发、强化了党内以至整个社会的激进主义思潮。尽管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党内务实派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但在具体问题上，党内的思想并不统一。面对荒谬的“大写十三年”，坚持中共一贯的文艺方针的务实派不能不表示异议——1963年2月8日，在首都文艺界元宵节联欢会上，周恩来发表讲话，回应柯庆施，强调要以“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同心同德，自力更生”的方针来发展社会主义文艺。3月8日，刘少奇听取文化部的汇报时说，“能表现现实生活的，就演现实生活的戏。不适合表现现实生活的，就演历史剧。”² 4月，中宣部在新侨饭店召开文艺工作会议，张春桥在会上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人表示不同意见。³ 同月，在中国文联三届全委二次扩大会议上，周恩来针对“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强调所有艺术应该以现代为主，但不要用粗暴的办法，把古代一律取消。这一观点，在8月召开的音乐舞蹈座谈会上，再一次得到强调。

值得注意的是，党内务实派表示异议的方式——对于如此荒谬的提法，无论是周恩来、刘少奇，还是周扬、林默涵都避免与“上海帮”正面交锋，所有的不同意见，都采用委婉曲折的方式来表达。这一现象表明，激进主义思潮已经在党内成了“老虎屁股”，党内务实派对它无可奈何。

不破不立，“大写十三年”是“立”，它所要“破”的是建国十三年来文艺界/电影界的成果。因此，“大写十三年”也就是“大破十三年”。当时间来到1964年的时候，大破十三年就变成了大破十五年——1964年6月11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曾同康生一起插话说：“唱戏这十五年根本没有改，什么工农兵，根本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那个封建主义同资本主义，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⁴ 同年6月23日，江青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则从“立”的角度，论证了大写十五年的重要性：“我们提倡革命的现代戏，要反映建国十五年来现实生活，要在我们的戏曲舞台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⁵ 而在文革

¹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中谈到大写十三年的时候，说：“他们的这些言论，对于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看法，认为文艺界已滑到修正主义的边缘，不能不有所影响。”第1266页。

² 《文坛风云录》第376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³ 《文坛风云录》，第375页。

⁴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第1266页。

⁵ 江青：《谈京剧革命——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6月23日）。引自吴迪编：《中国电影研究资料》（中），第445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江青这个讲话的时间，编者误为1964年7月。特此更正。江青的这一讲话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同年6月26日，毛泽东对这一讲话批示道：“已阅，讲得好。”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第1267页。

发动以后，十五年就变成了十七年——“十七年文艺黑线”成为打倒电影界领导、批斗电影人、批判十七年电影的最好理由。

第二节 弃旧图新：毛泽东的两个批示

1963年11月，毛泽东两次点名批评《戏剧报》和文化部：“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文化工作方面，特别是戏曲，大量的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果不改，文化部就要改名字，改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外国死人部。”¹一个月以后（1963年12月12日），在中宣部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第116号上，毛泽东做出了关于文艺的第一个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在《文艺情况汇报》所载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的下面，毛泽东还做了如下的批注：“许多共产党员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²

这个批示包括三种意思，第一，它认为建国以来的文艺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理由是它们以“死人”为主要的创作内容或创作对象。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写“活人”、演“活人”、唱“活人”、画“活人”，总之关于十三年的创作才是社会主义的。第二，它认为建国以来在文艺部门进行的以改造思想、深入生活、与工农相结合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取得什么效果，所以这些部门需要真正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从后来的情形可知，这种改造就是走“五七”道路，使文艺工作者变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新人。第三，它认为新中国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或生产方式）是社会主义的，而上层建筑（政治、道德、法律、艺术等观点及与这些观点相适应的制度）则不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阻碍了经济基础的变革。这预示着，毛泽东要摧毁原来的上层建筑——清洗某些政治、道德、艺术观念和由此形成的社会意识，推翻与原来的上层建筑相适应的制度，建立新的更革命的上层建筑、社

¹ 转引自陈播主编：《中国电影编年纪事》（总纲卷 上册）第49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

²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第1258页。

会意识和制度。

毛泽东的第一个批示下达后，一方面是激进派大造舆论，积极响应——1963年12月25日，柯庆施在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大会开幕式上讲话：“戏剧工作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¹另一方面是主管部门在组织上积极配合——“文化部党组自1963年底到1964年3月连续召开了7次党组会和党组扩大会议”，“党组对几年来的文化艺术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3月7日，文化部党组向中宣部上报《对几年来文化艺术工作检查报告》”。²党组决定从1964年3月下旬开始在全国文联和各协会全体干部中进行整风。电影界闻风而动，马上调整生产计划。1964年1月20日至2月1日，已经升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煤在南京主持召开全国故事片厂长、党委书记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定出题材比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占百分之六十，革命历史和战争题材占百分之三十，只给其它题材留了百分之十。这个题材比例在1965、1966年的电影生产中大见成效，1965年共生产电影47部，革命历史/战争题材只有6部；1966年共生产电影15部，革命历史题材只剩下1部——《大浪淘沙》。

1964年6月，文化系统的整风进行了3个月之后，以为可以过关了，向中央做汇报。万没想到，就在这份《全国文联及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毛泽东又做了第二个批示（6月27日）：“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是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个批示比起前一个批示来对形势的估计更严重，结论也更骇人听闻。前一个批示还说，“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到了这里变成了全盘否定、打倒一切。“据说有少数是好的”，其讥讽之意跃然纸上，“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其仇怨之情沛乎言外。

建国以来，在各行各业之中，除了农业，毛泽东对文艺抓得最紧，因此，文艺界始终是整肃的主战场：1951年至1952年的文艺整风，1953年批俞平伯，1955年批胡风，1957年的文艺界反右，1962年小说《刘志丹》案，都是毛泽东躬亲为。而在文艺各界之中，电影又是毛泽东最关注，最下气力，因此“成果”最为显著的地方：1951年批《武训传》、禁映《荣誉属于谁》，导致“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出现，使故事片生产在一年半中颗粒无收。1953年以“社会主义现实

¹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第1266页。

²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第1266页。

主义”统一电影界的头脑，公式化、概念化由此长期盘踞影坛。1954年批禁《清宫秘史》，1957年将钟惦棐打成电影界的右派代表，扼杀了电影界的改革。1958年用“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使电影创作凌空蹈虚。同时掀起的“插红旗、拔白旗”的运动，导致了大批优秀影片被打成毒草。1959年大放电影卫星，大搞献礼工程；劳民伤财，违背艺术规律……总之，在毛泽东做出上述批示之前的十几年中，电影界始终处在紧锣密鼓的“社会主义改造”之中。它不是“收效甚微”，而是收效甚巨。15年间制作的影片证明了这一点。

1949年至1964年的15年间，新中国共生产了602部影片（包括戏曲、歌舞，文艺汇演、话剧和未发行的在内），其中表现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现实题材330余部，占总数的55%，革命历史和斗争题材160余部，占总数的26.3%，其它题材（古代、民国、神话）110部，占总数的18.7%。表现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现实题材是革命历史/战争题材的两倍，是一般历史题材的三倍。表现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题材与革命历史/战争题材占总数的83%。¹统计数字表明，对于电影界来说，柯庆施“写古人、死人”的说法，完全是颠倒黑白。毛泽东做出上述批示，才真正是“咄咄怪事”。

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对自己、对文艺界做出如此彻底而决绝的否定呢？答案就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反修防修”之中。出于对知识分子的疑虑，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恐惧，他认为“整个文化部都垮了”，文艺系统“至少有一半不在我们手里”²。毛泽东企图通过否定15年的成绩，否定15年来由文艺界建构的意识形态，来创立新的意识形态，以便将中国建设成一个一大二公、无私无欲、纯而又纯的乌托邦。政治激进主义的涡轮驱动了文艺激进主义的战舰，政治与文艺最终合为一体。

有些电影界的人认为，电影界的文革是在1965年开始的。此话不无道理。从文艺思想上讲，毛泽东的两个批示为文艺界开展文革奠定了思想基础——文革中，无论官方媒体还是地方小报，无论是红卫兵，还是造反派，对文艺界/电影界的批判，对十七年强加的罪名，都来自这两个批示。

第三节 第三次文艺整风：“夏陈资产阶级路线”

1964年7月11日，毛泽东的第二个批示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正式下达。中宣部布置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党组进行整风检查。文化部立即行动起来，检查本部、文联及各协会近几年的工作。“周扬在布置整风的工作会议上宣布：此次整风不搞群众运动，不追究责任人人过关（原文如此——本书作者），主要是检查执行

¹ 见《中国影片大典》（1949.10—1976），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

²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第1264页。

党的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整顿队伍，改组领导，然后分批下去参加四清。”¹8月下旬，经过一个多月的检查工作、统一思想之后，文艺系统开始全面整风。

整风期间，不断地传来毛泽东对文化工作越来越严厉的斥责之声：“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²“文艺团体也要赶下去。文化部可以改为‘帝王部’，最好取消。农村工作部可以取消，为什么文化部不可以取消？”³，“文化系统究竟有多少在我们手里？20%？30%？或者是一半？还是大部分不在我们手里？我看一半不在我们手里。整个文化部都垮了。”⁴

在毛泽东的批示和斥责的指引下，一条在文化系统盘踞多年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被发现，夏衍、齐燕铭、邵荃麟、田汉、阳翰笙、陈荒煤被视为代表。作为电影界的主管，夏衍和陈荒煤顺理成章地成为电影界“资修”错误路线的领军人物，批判揭发来势汹汹，检讨服罪自不可免。夏衍被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陆定一当着干部的面，拿着30年代出版的电影剧本《赛金花》，痛斥作者夏衍。陈荒煤多次检查自己的路线错误，其外甥女也被动员来在批判会上检举他。周扬还当着陈荒煤的面，表扬了他的外甥女。⁵

夏、陈所领导的影协成了整风的重点，所整的“主要是30年代问题，如夏衍出版的论文集有吹捧30年代的文章，中国电影发展史问题，观摩30年代电影问题……”⁶周扬给夏、陈划了圈圈，要求他们在四种情况内“检查工作”：“一、有一条与党对立的路线；二、基本不执行党的政策；三、在资产阶级进攻下，一个时期动摇了；四、一贯执行党的路线。”⁷经过半年多的揭发和批判，陈荒煤“承认电影犯了路线错误”，并“按照周扬提出的四种情况，他勉强把自己归为第二类”。⁸1965年1月22日陈荒煤在文化部干部大会上为自己定了性：

自从整风以来，经过大家的揭发和批判，又参加了电影局的小组和北影厂的整风会议，大量的事实帮助了我、教育了我，认识到电影在我和夏衍的领导下，最近许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系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路线，顽强地对抗党的文艺方针，反对毛主席的文艺方

¹ 转引自严平：《燃烧的是灵魂——陈荒煤传》，第184页。“不追究责任人人过关”似应为“不追究责任，不搞人人过关”。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

² 1964年7月5日，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264页。

³ 1964年8月20日，毛泽东与薄一波谈话。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264页。

⁴ 1964年11月26日，毛泽东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的插话。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下卷，第1264页。

⁵ 《文坛风云录》第458页。

⁶ 《文坛风云录》第185页。

⁷ 《文坛风云录》第185页。

⁸ 《文坛风云录》第187页。

向。¹

“一位曾经参加了文化部整风批判会的老电影工作者说，那些发言听上去简直莫名其妙文不对题。但重要的是你说了，谎言重复一百次就会变成真理。”²

中宣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这条路线的基本内容是：提出文化为各阶层服务，来代替文艺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主张文艺要‘离革命经、叛战争道’，反对文艺表现工农兵，表现社会主义；提倡封建复古，反对推陈出新；提倡‘中间人物’，反对写工农兵中的英雄人物；鼓吹30年代文艺传统，抹煞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传统；企图以个人领导代替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³作为文化部的最高领导，在“一条汉子整三条汉子”的同时，⁴周扬也不得不为当年制订的“文艺八条”作检讨：“制定文艺八条，只看到大跃进中的缺点和错误，比较多地听了历次运动部分受伤害人的意见。这些意见是应该听的，克服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也是应该的。但是，只总结了一方面的经验，文件精神是偏右的。整个文件革命精神不够，执行中又向右的方面发展，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⁵

在文化部整风的同时，各电影厂的整风也在紧张进行。“张春桥派出工作组进驻上海电影系统，首先把瞿白音的《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定为‘夏陈路线’的理论纲领，把《红日》、《舞台姐妹》、《不夜城》、《燎原》、《大李、小李和老李》、《球迷》、《聂耳》、《白求恩大夫》等上影系统出品的数十部影片定为‘毒草’。一批局、厂党政领导干部和著名电影艺术家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生产被迫停顿，人心惶惶。”⁶

与夏、陈关系最为密切的北影厂是这次整风的重点。1964年8月，中宣部抽调了文教界的四十名干部，组成工作队，进驻被中宣部视为“问题严重，创作思想混乱，经营方向也有问题”的北影。⁷经过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到各个车间的调查了解之后，以水华、崔嵬、凌子风、成荫为艺术指导的四个创作集体⁸和文学编辑部被锁定为整风的重点。工作队在组织职工学习毛泽东的两个批示之后，要求大家联系北影的实际，思考存在的问题。随后，工作队“召开由主创人员、中层干部、群众代表参加的中型会，揭发问题。焦点集中于创作思想和干部

¹ 《陈荒煤在文化部整风中的检查》（1965年1月），见严平：《燃烧的是灵魂——陈荒煤传》第188页。

² 同上第190页。

³ 《文坛风云录》第455—456页。

⁴ 《文坛风云录》第458页。

⁵ 《文坛风云录》，第302页。作者谈到：“当然，这个检讨也只是‘阳奉’，私下里，他还要‘阴违’，后来他又在同林默涵、袁水拍谈话时，特别讲，毛主席说，他看了文艺八条，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⁶ 杨金福编著：《上海电影百年图史》（1905—2005）第233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年。

⁷ 周啸邦：《北影四十年》第178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

⁸ 这四个创作集体是1959年9月间成立的，详见《北影四十年》，第59—60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

作风，矛头主要针对汪洋、崔嵬和凌子风等厂级领导及主创人员。对二集体的意见尤为尖锐，认为二集体就是毛泽东批示中说的‘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而专门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部门，（后来二集体被称作‘帝王将相集体’）；而广大创作人员则是‘不执行党的政策’、‘不去接近工农兵’、‘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北影已经出现了‘裴多菲俱乐部’。有人将北影的问题归纳为‘十大矛盾’，是‘四不清’单位。有人指名道姓指责某某某烂掉了，还有人把困难时期分到北影的100名复员军人没有被接受说成‘迫害解放军’，挑起了群众的激愤。于是干部和干部之间、干部和群众之间、群众和创作人员之间、创作人员相互之间，一时矛盾重重，相互攻讦，彼此关系紧张，多年形成的和谐与团结，旦夕之间均遭破坏，埋下了此后‘文革’期间群众斗群众的隐患。”¹

在各电影厂的整风中，北影的整风所用时间最长，持续了整整十个月的时间（1964年8月到1965年6月）。整风的成果之一是“为了突出政治，加强领导，北影变厂长负责制为党委领导下的集体领导。”之二是，“为了加强政治工作，成立了政治部。”之三是，“撤去了厂长汪洋的职务，调沈阳军区许里任党委书记，原工作组组长吴小佩留厂任副书记。”²

夏衍、陈荒煤成为资产阶级路线的代表并不奇怪。60年代初，当他们疏离激进文艺思潮，与周扬等人集体退却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这个结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中宣部对他们的指控，有捏造，也有事实。无论事实还是捏造，都以上纲上线、“五子登科”的老办法来做结论——他们确实“提出文化为各阶层服务”，但绝没有“代替文艺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的意思；他们确实“主张文艺要‘离革命经、叛战争道’”，但绝非“反对文艺表现工农兵，表现社会主义”；他们“提倡‘中间人物’”，但绝不“反对写工农兵中的英雄人物”；他们并没有“鼓吹30年代文艺传统”，只不过不像激进文艺那样，全盘否定30年代文艺。说他们“抹煞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传统；企图以个人领导代替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完全是扣帽子、打棍子。

事实上，他们做梦都在想着如何发扬光大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文艺传统，而对党的领导，他们竭尽忠诚——为了更好地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更好地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更好地遵循延安讲话的精神，总之一句话，更好地贯彻党的文艺路线，他们企图在为政治服务与遵守艺术规律之间找到一个立足点，看着艺术日益化为政治的图解，他们忧心忡忡，试图拉住一路狂奔的激进文艺的战车，把它拉回到“大跃进”以前。

¹ 周啸邦：《北影四十年》第178--179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

² 同上，第180页。

1965年4月，整风结束，文化部改组，由陆定一兼任部长，调南京军区政委肖望东任副部长、党组书记，林默涵、刘白羽、石西民、赵辛初任副部长。夏衍、陈荒煤等人被调离。夏衍调到对外文委，成了亚非拉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员；陈荒煤调任重庆副市长。整风期间，毛泽东说过：“荒煤不检查，送到北大荒挖煤嘛！”¹经过痛苦的折磨，他终于用违心的检查免除了挖煤的命运。但是，他没想到，一年后降临的文革将他和夏衍置于比挖煤更悲惨的境地——两人先是被揪斗，随后被关押——1966年12月4日深夜，夏衍被红卫兵带走，受“监护”8年零7个月，1968年，陈荒煤被北京卫戍区关押，在狱中度过了7年。

新时期以来，随着夏衍、陈荒煤的复出，文艺界对他们所受的冤屈寄以极大的同情，对“四人帮”对他们的迫害报以极大的义愤，对他们在电影界的贡献给予极高的评价，甚至被誉为“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负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广光明的地方去”（鲁迅语）的反左英雄²。“夏陈路线”从此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块令人敬仰的丰碑。然而，这块丰碑所记载的只是片面的溢美之词——新中国电影走到这一步，电影主管们大有功焉。反右派的时候，深谙电影创作规律的夏衍并没有站出来为艺术规律说话，“大跃进”严重地破坏了电影创作，夏衍却为其歌功颂德。³1951年，陈荒煤在中南军区任文化部长时，就大力提倡创造英雄人物，⁴1956年大鸣大放时，陈荒煤坚决反对钟惦棐等人的改革主张；1957年反右派时，他对右派分子的批判不遗余力，上纲上线⁵。1958年，他紧跟康生，在电影界大“拔白旗”，为电影界的浮夸风推波助澜……蔡楚生、袁文殊、瞿白音等人在文艺整风、反右派、大跃进等运动中的激进表现亦历历可查。邓小平承认：“责任不只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我们这些人也有责任。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⁶

与绝大部分党员干部一样，他们是盲从的循吏，是辛苦的忠臣。正是在这种辛辛苦苦的盲从之中，极左思潮愈来愈烈。在过去的15年中，他们拥护、推动、助长、执行了激进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政策，为此时的下场开辟了道路。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儿女造就了革命。被革命吃掉固然值得同情，但这种同情是有底

¹ 转引自严平：《燃烧的是灵魂——陈荒煤传》第187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

² 严平：《燃烧的是灵魂——陈荒煤传》第177页。

³ 参见夏衍发表在1960年2月2日《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为电影的继续大跃进而奋斗》。

⁴ 陈荒煤在1951年至少写过三篇关于这方面的论文：《为创造新的英雄典型而努力》，《创造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的英雄典型》，《向创造革命英雄主义的典型更前进一步——中南军区及四野全军戏剧歌咏观摩会演的总结报告》。见《为创造新的英雄典型而努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这些文章对此后的有关创造英雄人物的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参见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第三章第三节“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的讨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⁵ 严平在《燃烧的是灵魂——陈荒煤传》中对陈荒煤在反右中的表现做了这样的描述：“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北京电影界连续召开了15次批判大会，荒煤主持了批判。随着批判的深入，又有人揭发出一些有关钟政治方面的言论，但荒煤没有把问题扩大，在他主持的会尽可能地把批判控制在《电影的锣鼓》范围内。他仍然把钟的行为当作‘思想认识’问题对待……”（第148—149页）。这种说法与事实相距甚远。参见本书中编“从百花齐放到万马齐喑”的有关内容。

⁶ 《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的问题》《邓小平选集》三卷，第335页。

线的。这个底线就是，被革命吃掉的冤屈不应该成为掩盖其为革命所行恶政，所养恶德的理由。把责任推到革命身上，而为其儿女歌功颂德的作法是需要反省的。

“在探讨总的指导思想失误的同时，不能忽视各个领域一些主要负责人的责任。”¹ 这是一位当事人对 17 年文艺的总结。毫无疑问，夏衍，尤其是陈荒煤对 17 年电影的失误负有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责任，这种责任不应该因为他们受了文艺整风的冤屈，受了“四人帮”的迫害而改变性质，以至于在主流话语里变成值得炫耀的资本。

前中宣部文艺处干部，这次文艺整风的亲历者黎之认为：“毛泽东说‘整风’作为我们党的一大创造。周扬在《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称 1942 年整风为‘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我觉得 1942 年的整风只是一次‘统一思想的运动’，不是思想解放运动。建国以后的几次‘整风’效果都不理想。而 1964 年的‘文艺整风’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² 本书第一章说过，整风是思想改造的方式之一，整风力图把所有人的思想统一成一种思想。就长时段的历史而言，它绝无成功的可能；但就短短的十几年而言，它是成功的。成功的标志就是，人们心悦诚服地，一步步地走向了毁灭。

第四节 清算“修正主义”：第三波“非主流”电影

在文艺整风的同时，展开了全国性的文化批判——哲学界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经济学界批判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和“企业利润观”，史学界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文艺界批判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论”，戏剧界批判阳翰笙的“有鬼无害论”，美学界批判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而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批判运动则是由全民参加的，国内主要媒体发动的，持续了 16 个月之久的对《早春二月》、《北国江南》、《不夜城》、《林家铺子》等“修正主义”影片的清算。

这些所谓的“修正主义”影片，也就是 17 年电影史上出现的第三波“非主流”电影。周扬、夏衍、陈荒煤从 1959 年开始的对激进文艺路线的集体疏离，60 年代初文艺政策的调整，以及夏衍等高层领导对《早春二月》等影片的鼎力支持，是这批“非主流”电影问世的主要原因。尽管这些影片与主流一样紧跟时代精神、强化阶级斗争，但是，我们仍旧可以发现它们有别于主流的地方——对现实主义的固守，对人情人性的关注，对生活中的情趣，或者说对电影娱乐性的留恋。

经过十几年的改造，现实主义在电影创作中已经相当稀薄，50 年代末 60 年

¹ 《文坛风云录》第 532 页。

² 《文坛风云录》第 449 页。

代初的宽松语境，唤起了电影界打破公式，抛开概念的创作热情，第三波“非主流”中的部分影片对此做了勇敢的尝试。《逆风千里》、《红日》、《兵临城下》和《独立大队》等影片，突破了丑化反面人物的僵死模式，比较真实地描写了国民党军官的嚣张顽强，塑造出了复杂多面的土匪形象，在人物个性刻画上前进了一步。《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更是大胆地将边缘人物——小资文人、梨园艺人和小店老板作为主角，对他们的内心世界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塑造出了感人的形象。

经过十几年的批判，人情人性在电影中成了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代名词，这批电影涉足禁区——《北国江南》恢复了党员身上的人情味，《舞台姐妹》表现了异姓姐妹间的手足之情，《早春二月》在一个小资“徬徨者”身上寄托了对人道主义的向往。《革命家庭》、《英雄儿女》、《阿诗玛》、《苦菜花》等影片则浓墨重彩地表现了革命者的血缘亲情和男女之爱。

经过 1957 年反右和 1958 年“拔白旗”对讽刺性喜剧的批判，喜剧成为编导演的畏途。为了躲开“雷区”，电影界以“歌颂性”喜剧代替“讽刺性”喜剧。这批电影中的《大李老李和小李》、《球迷》、《锦上添花》等总算给枯燥乏味的影院带来了些许笑声。

同前两次一样，第三波“非主流”电影都是“在一个时间里被肯定和推崇”的作品，《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红日》、《锦上添花》等影片在刚刚拍摄或公映时，曾赢得上下一致的肯定和赞扬，有的影片还获得了“百花奖”（如《革命家庭》），荣列国庆十周年的献礼片之中（如《林家铺子》）。

从整体上讲，第三次“非主流”作品，比前两次更靠近威权话语，更接近主流意识形态。换言之，第三次“非主流”比前两次更加符合时代精神——《革命家庭》、《英雄儿女》、《阿诗玛》、《苦菜花》等表现的是革命者在对敌斗争中的亲情和爱情，其意识形态的纯正性与教育性远远超过了“恋爱至上”（康生语）的《芦笙恋歌》和表现“三角恋”的《花好月圆》。《逆风千里》、《红日》、《兵临城下》等作品无非是把国民党军官写得不那么软弱无能，不那么俯首贴耳，其目的是反衬革命军队的英勇善战和勇敢机智。无论在思想深度、现实意义，还是在揭示人性的真实性方面，都无法与“借口反映真实，干预生活”（陈荒煤语）批评党员干部腐化变质的《谁是被抛弃的人》和最初版本的《探亲记》等作品相比。同样，《大李老李和小李》、《球迷》、《锦上添花》等“歌颂性”喜剧，以回避现实矛盾，表彰好人好事为宗旨，与批评官僚作风、嘲讽人性恶德的《未完成的喜剧》、《新局长到来之前》、《球场风波》、《寻爱记》、《三个战友》的社会意义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即使是最大逆不道的《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和《北国江南》，所表现的人情、人性，人道主义实际上在影片中处于被否定的或从属的地位——

文嫂的自杀证明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破产，萧涧秋终止徘徊，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中去。月红被资本家拉拢腐蚀，当了唐经理的小老婆，与春花的姐妹深情在阶级斗争中瓦解。小旺放弃进城的想法，不仅是被养母银花的亲情感动，也是因为反革命分子钱三泰的破坏。暴力革命（“时代的洪流”）、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在影片中是被正面肯定的最高的道德指向和人生价值。可以说，比起“千方百计，借尸还魂地来表现、宣扬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而成为“白旗”的《情长谊深》、《上海姑娘》、《青春的脚步》、《悬崖》等作品，¹《早春二月》等影片并没有走得更远。

上述影片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原因很简单，第三波“非主流”的出现，是文艺思潮进一步激进化的产物。也就是说，这些“非主流”影片的创作者其实是很想主流的。他们的作品之所以被打入冷宫另册，成为官方和媒体讨伐的“非主流”作品，仅仅是因为文艺评判体系和社会政治标准发生了变化，使它们成为激进文艺思潮的靶子。这里所说的变化，指的是阶级斗争以及由此衍生的更激进更革命更纯正，用人们习惯的说法就是“极左”思潮。

这种“非主流”的蜕变是有一个过程的：50年代初的“非主流”出现在文艺规范尚未建立或正在建立之中，电影人的思想束缚最少，政治上最为宽松，因此，那个时候的电影也走得最远，以至于出现了《武训传》这样的“歌颂改良主义”的作品。1956年的“非主流”出现在执政党第一次改革之时，在“双百”方针和电影改革的鼓舞下，在乍暖还寒的“早春”气候里，解冻的电影人也还有一定胆量向现实主义回归，向题材挑战。到了60年代初，经过了反右、全民整风、反右倾等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绝大部分有艺术个性和独立见解的电影人都受到残酷的整肃，侥幸逃脱的电影人要么放弃自我，顺从主流；要么如履如临，战战兢兢。挑战陈规的勇气全无，创新出奇的意志罕见。万马齐喑，万家墨面。陈荒煤在一次讲话中抱怨：“我们发了几十封信，征求对工作方法十八条和十七条措施的意见，到现在仅仅来了三封信，很多艺术家都还没有回信。”²在这种情况下，不用说是“非主流”，就连主流影片也大幅度减产。周扬的民主意识萌发，试图用“双百”方针和无产阶级的“德先生”、“赛先生”来挽救人心³。1961年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周扬就直言不讳地说：“一连串的斗争所带来的消极因素，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民主生活受到了一定影响。有些同志以为‘双百’方针可以不贯彻，主要搞斗争、搞运动，因而民主的生活受到了影响。我们提倡敢想、敢说，有的人就不敢说不敢想；我们提倡大鸣大放，有的人就不敢鸣不敢

¹ 陈荒煤：《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1957年电影艺术片中错误思想的批判》，载《人民日报》1958年12月2日。

² 《陈荒煤同志在北影、八一两厂部分领导同志和创作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1961年3月7日），文化部存档资料。

³ 参见陈顺馨：《1962：夹缝中的生存》第六章。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

放。”¹ 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波“非主流”的整体萎缩是无可避免的。

对第三波“非主流”的清算是从评论开始的。17年的电影评论——如果我们把政治批判也算做电影评论的话——有两种方式：本体评论和政治索隐式批评。后者以两种模式展开，一种是由政治运动引起的，如反右派运动、“拔白旗”运动。另一种是由领导人（如康生、毛泽东）引起的，如《武训传》批判和这次对“修正主义”影片的清算。与《武训传》批判相类，在这场清算运动到来之前，评论界也曾为《北国江南》等影片展开过“学术讨论”；不同的是，这种“学术讨论”已经被十多年的思想改造提纯净化，不但没有了建国初期的“思想混乱”（毛泽东语），而且即使逆流而动的肯定性文章，其思维模式、立场观点和语言表达也都完全彻底地主流化、政治化²。也就是说，对立的双方都是在用时新的主流话语——八届十中全会提出来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解释这些影片。他们的分歧仅仅在于，肯定者认为影片正确地描写了阶级斗争，否定者认为影片抹煞了阶级斗争。很显然，否定者掌握了时代精神，更符合激进主义的要求。

这种“学术讨论”相当短暂，从1964年6月始到同年8月终，不到两个月即转向政治批判。转折点是康生7月29日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总结会上的讲话。在这次讲话中，康生公开点名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逆风千里》、《舞台姐妹》等影片。此后，全国媒体不约而同地结束了“学术讨论”。1964年8月18日，中宣部将《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呈报中央。毛泽东在上面做了这样的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到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11天后（8月29日），中宣部向全国发出《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通知》。自此，清算“修正主义”影片的运动在全国展开。半年后（1965年4月22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林家铺子〉、〈不夜城〉的通知》，为“清算”运动加薪添柴，向深广发展。在文革发动前夕，《抓壮丁》、《兵临城下》、《红日》等影片也成了公开批判的反面教材³。1966年2月出笼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江青5月在全军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使这一批判在范围和罪名上大幅度升级，17年生产的大部分电影都成了批判对象，这一批判运动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¹ 《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1年7月17日，《周扬文集》第四卷，第21页。

² 这一点从某些文章的题目上就可以看出来：《惊心动魄的两条道路斗争》（弋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学步），《反映农村火热斗争的真实画幅》（王拯）见新华月报编辑部编《关于北国江南的问题》（第一辑）第29—30页。北京：三联出版社，1964年。

³ 1966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梅介人等撰写的、题为《违反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坏影片〈兵临城下〉》的批判文章，随后全国各大报纷纷发表同类文章。4月26日、27日，《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分别发表了一组批判《抓壮丁》的文章。5月14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大报连续发表文章，批判《红日》。

为了配合这场文化批判运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为这4部影片的批判文章做了《报刊资料索引》，根据笔者的统计，从1964年9月至1965年底，全国主要报刊发表批判《早春二月》的文章724篇，《林家铺子》325篇，《不夜城》407篇¹，《北国江南》316篇²。16个月中，总计发表批判文章1772篇，平均每月110篇，每天3.7篇。在这一批判队伍中，担任主力的是知识分子，其中不乏文艺界的著名人士，如巴金、以群、李希凡等；电影界、戏剧界中的领导和业务骨干，如张骏祥、汪流、黄式宪、汪岁寒、马德波、谭沛生、王云缙等。在发表批判文章的同时，省部级刊物还召开了各种座谈会：工农兵座谈会、青年思想座谈会等。其模式与以往的思想文化批判运动别无二致，其规模只有14年前的《武训传》批判可比³。与《武训传》批判不同的是，这一次批判的内容已经从改良主义、封建主义上升到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以及被归为资产阶级的人性、人情、人道主义。从这种“进步”中，可以感受到激进文艺思潮后浪推前浪的勃勃生机。

本书第一章说过，整风和文化批判都是思想改造的组成部分。因此，这次对“非主流”影片的清算实质上是一次全国性的思想改造运动。对于改造者来说，思想改造的重要步骤之一，就是把复杂的事物简单化，换句话说，就是给事物加上某种政治符号或贴上政治标签。而被改造者则要做两件事，一是对政治符号/标签的认知——理解这些成为客观存在的符号和标签，“运用更多的相互关联的符号来评价它、解释它、规定它的意义，并促进进一步的行动。”⁴二是在此基础上确立自己的政治行为的目的性，也就是为自己的行为找到意义。也就是说，被改造者需要一个“理性化过程”（reasoning process）。思想改造是一个社会性的活动，作为社会共同体，改造者与被改造者需要建立一个共同的逻辑体系，或者说叙述结构，在这个结构里，有叙述者，有受众，前者往往借助于主观想象，通过讲故事来解释历史与现实，使常识服从于逻辑。后者则往往通过诠释这些故事来响应改造者。政治传播学称这种现象为“叙述理性化”。⁵

清算第三波“非主流”正是这种“叙述理性化”的典型范例。人们，主要是知识分子，为了诠释改造者关于阶级斗争、修正主义的“大故事”，以批判文章的形式编造出无数“小故事”。这些“小故事”尽管枉顾常识，乖情背理，但都充满理性、逻辑严密、论点鲜明而论据确凿。当然，由于他们都按照一个声音说话，所以无论怎么讲，所有“故事”都千篇一律，万众一腔。

¹ 见《电影〈早春二月〉、〈林家铺子〉、〈不夜城〉的讨论与批判报刊资料篇名索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1966年1月。

² 见《关于电影〈北国江南〉的讨论报刊资料索引》（一、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1964年9月25日及1966年1月。

³ 批判《武训传》时发表的批判文章总计857篇，见张明主编《武训研究资料大全》，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

⁴ 许静：《大跃进运动中的政治传播》第125页。香港社会科学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2月。

⁵ 参见许静：《大跃进运动中的政治传播》第五章 政治行为的理性化。

⁵ 同上。

关于《早春二月》的“故事”，人们讲得最多的是人道主义，电影的主人公萧涧秋自然成了众矢之的。批判者遵循着这样一个逻辑：萧涧秋表面上是在救济文嫂，实际上是在麻痹民众。资产阶级一贯用人道主义来抹杀阶级分野，蒙蔽阶级意识，以达到取消阶级斗争，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目的。这与主张阶级调和、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国际修正主义异曲同工，因此，拍摄这部影片就是要在国内大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按照这个逻辑，任何对人间不幸的怜悯、对弱势群体的同情都是对革命的背叛；任何对高尚人格的追求、对美好感情的渴望都是对历史进步的阻碍；任何对受难者的援手、对受苦人的帮助都是对无产阶级的毒害。总之，怀有善良之心、人类之爱、“人溺己溺，民胞物与”等普世观念的人，在道德上是邪恶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

在众多的批判者中，以批俞平伯赢得毛泽东好感，跃居文学批评家之列的李希凡格外引人瞩目。他以电影篡改了小说立论，认为影片为了把萧涧秋打扮成一个人道主义者，“掩盖了”小说中“萧涧秋对文嫂的暧昧的感情关系”，“以便突出地表现萧涧秋的‘崇高’。”“实际上影片中所描述的萧涧秋不断救济文嫂，即使撇开他们之间的感情关系不说，也不过像有钱的少爷拿出几个铜板来救济穷人一样，并没有什么值得赞扬的地方；这种所谓善行不但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反而只能起巩固现存剥削制度的作用。”萧的行为“正是起了在精神上麻痹被压迫群众的作用，他不但并没有解决文嫂的苦难，使她得到真正的幸福，反而把她推上了毁灭的道路。”为了让这个“故事”更生动有力，作者采用了讲故事者惯用的历史联系法：“影片所描写的背景是1926年前后的江浙一带的社会生活。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的激变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在南方，革命的浪潮正猛烈地冲击着旧秩序。在这个时候，人民所需要的正是革命的思想武装，用以彻底摧毁旧制度。而萧涧秋却对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运动抱着完全冷漠的态度，他极力鼓吹‘以爱拯救世界’的药方，对人民散布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毒素。他同文嫂的关系正是集中地表现了他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欺骗性和虚伪性，这种思想同当时的革命潮流是完全矛盾的。”通过这种教条主义式的历史想象和强辞夺理的人物分析，作者给影片下了这样的结论：“当前，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不遗余力地鼓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并且企图用人道主义代替共产主义。《早春二月》的编导适逢其时，塑造了一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形象。而其意图又不在于批判这个人物，而在于美化他、歌颂他，这不正好迎合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需要吗？我们不能轻视它的危害作用，必须一层层剥掉它的伪装，揭露出它的真实面目，给以彻底的批判。”¹

¹ 李希凡：《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美化——再评〈早春二月〉中的萧涧秋形象》，载《人民日报》1964年10月29日。

关于《北国江南》的“故事”，人们讲述的与《早春二月》同中有异，除了对人道主义的讨伐外，更多的是对阶级斗争的解释和对塑造人物问题的阐发。在批判者看来，这部描写农村阶级斗争的影片，恰恰抹杀了阶级斗争。理由是，影片描写了阶级敌人猖獗的破坏活动，却既没有写出革命群众对阶级斗争应有的警惕，更没有表现出他们的战斗精神。这当然与人物塑造有关，影片中的正面人物——吴大成和银花，一个是只知道蛮干的粗人，一个是动不动就哭天抹泪的瞎子，这样的党员干部充其量只配做“中间人物”，怎么能做正面主角！这里面的逻辑很清楚：不管现实生活如何，艺术中的阶级斗争一定要按照公式来写，正面人物则必须高大完美，性格坚强，明察秋毫，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性格上的弱点和生理上的缺陷。他们必须时刻保持着对阶级斗争的高度警觉和敏感，只要生活略有异常，就应该马上想到阶级斗争。

在大多数批判者中，北京电影学院教师汪岁寒和黄式宪得风气之先，他们在毛泽东做出批示之前就撰文声讨《北国江南》。《人民日报》还特地为此文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肯定了两位作者的看法——“这部影片在怎样反映时代精神，怎样正确反映阶级斗争，怎样塑造正面人物，怎样对待中间人物等一系列问题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都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并且提醒人们，“汪、黄两同志所提到的这些问题，也是目前文艺工作中从理论到创作实践的一些根本性问题”。¹ 对于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两位作者做了如下的阐释：时代精神应该是阶级斗争，而在影片中却“看不见‘阶级斗争的红线’”。“表面上是写了阶级斗争，然而，影片绝大部分篇幅描写的，却只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嚣张活动以及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人们并看不见革命人民对他们的斗争。”² 影片中的正面人物吴大成，没有一点革命战士的斗争智慧，更谈不到无产阶级革命理想主义的光辉了。“这个人物，完全是作者的主观臆造，完全歪曲了农村干部的真实形象。”³ 其中的绝大部分人物，包括正面地位的角色，实际上都是“一群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文章最后提出，评论这部影片“有必要同目前文艺界正讨论的两个重大问题联系起来研究”，一个是周谷城的美学思想“时代精神汇合”论，另一个是文艺界提倡的“中间人物”论，两位作者认为，“《北国江南》这部影片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正是反映周谷城的美学思想的典型。”同时，它也正是以“中间人物”论为创作思想的典型。⁴

在《不夜城》的“故事”中，资本家成了讲述的焦点。批判者的逻辑是，资本家的身上只有阶级性，而没有人的其它属性，因此，他们不可能爱国，不可能

¹ 1964年7月30日《人民日报》编者按。

² 《应当严肃认真地来评论影片北国江南》，原载1964年7月30日《人民日报》，转引自《关于北国江南的问题》第29—30页。北京：三联出版社，1964年。

³ 同上第33页。

⁴ 同上第35—36页。

爱党，不可能拥护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他们不可能接受任何改造。因为阶级本性不可能改变，所以，他们拥护公私合营是假，关心工人是假，关心生产也是假，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如何夺回失去的天堂。

在众多批判文章中，著名文艺理论家以群的解读别有特色。他从诠释剧中人物的方式切入：第一个人物是电影中的党代表瞿海生，区委工业部部长，根红苗正的工人阶级。他解放前饱受资本家的压迫，解放后却反对老婆银弟跟资本家算旧账，而要把资本家“带进社会主义”。当银弟因被迫试行资本家决定的“加速运转”操作而受重伤时，他对资本家仍然“没有激动，也没有愤恨，没有一字揭露，也没有半句批判，而是温和冷静地开导对方：张经理，不爱惜工人是天大的罪过……工人阶级是不记私仇的。”根据这些表现，作者得出结论：此人不是共产党，而是全民党，不是无产阶级的工运干部，而是资产阶级的工运干部，他执行的不是中共的政策，而是和平共处的修正主义政策。总之，“他是个挂着共产党员招牌，向群众散布对资产阶级投降主义，实质上就是为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作思想上的准备。”以群诠释的第二个人物是第一代资本家——光明染织厂的创始人张耀堂。作者用“历史唯物主义”武器对他进行解剖之后，严正指出，影片把张耀堂描写成一个谨慎、老实、勤劳朴素、靠诚实劳动发家的人。说他是学徒出身，到上海时是光身带个铺盖卷，吃辛吃苦几十年才挣下家业，才有钱送儿子张伯韩留英读书；这是十足的谎言，是为剥削阶级唱赞歌。对于第三个人物——第二代资本家张伯韩，作者的诠释更见功力：他既然是在抗日时期的上海经商，那么他就只有两条路，要么向日本投降，要么投靠其它帝国主义；他既然是资本家，就不可能爱国，就不可能赞成公私合营，更不可能心甘情愿地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影片如此美化他，“实际上就是企图让资产阶级长期存在，要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和平共处，宣传对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¹

《林家铺子》的情况与《不夜城》相似，都要围绕资产阶级讲“故事”。不同的是，经营小店铺的林老板比不上资本雄厚的张氏父子，他只是商品经济中的一只“小鱼”，既有被“大鱼”吃的可怜，又有吃“虾米”的可憎。按照当时的理论，所有的批判者都把想象力用在其可憎上面，其逻辑是，中小资产者也是剥削阶级，只要有资产，不管是放利钱，还是开店铺都是剥削行为。影片流露出对林老板一家的同情，就是同情资本家，同情剥削。同情资本家就是仇恨工农兵劳苦大众，同情剥削就是为万恶的旧社会招魂，就是要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因此，也就是向人民兜售修正主义。

根据这一逻辑，著名作家张天翼质问改编者夏衍：“为什么要在今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代搞出这么一部影片来？用意何在？”其实作者早就有

¹ 以群：《宣传阶级投降主义的影片〈不夜城〉》，载《文艺报》1965年第7期。

了答案：“这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资方代言人，是资产阶级的辩护士。抛出这样的作品，那是资产阶级要同无产阶级较量，要同无产阶级争夺年轻一代人，是资产阶级搞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¹

前面说过，对第三波“非主流”电影的清算在16个月中发表的批判文章达1772篇，这就相当于国家主要媒体在长达480多天的时间里，在醒目的版面上，以每天三次以上的频率，宣传、推销着同一种商品。“谎话说上一千遍就是真理”的名言，通过内容的高度重复与时间的大量积累再一次得到验证。与企业做虚假广告不同的是，这些广告的制作者同时也是商品的购买者。制作者之所以相信这些虚假广告，是因为他们经过了理性化的思想改造，他们编造“故事”，进行“叙述理性化”的过程，既是说服自己，也是说服别人的过程。法国大众心理学家勒庞说过，定期出版物可以取代领袖的作用，“这些定期出版物制造有利于群众领袖的舆论”，向群众“提供现成的套话，使他们不必再为说理操心”²。像以往的社会政治运动一样，在这次清算运动中，作为定期出版物的报刊担负起“洗脑”的重任，将影响群体最有效的方式——“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发挥到了极致³。大众心理学所说的这三种方式，与政治传播学所说的符号化/标签化和理性化从不同角度帮助我们了解这次清算的实质。如果我们对历史做纵向的、历时的观察的话，就会发现，符号化/标签化和理性化的过程同样贯穿于1962年到1965年的政治变化之中——如果说，两个指示是毛泽东对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符号化、标签化，那么，文艺整风和文化批判则是对“两个批示”的理性化。这一理性化通过一系列政治行为——揪出“夏、陈集团”，肃清各种资产阶级观念，发动全国性的清算“修正主义”影片运动——而落到了实处。通过这一过程，远至阶级斗争的理念，近至两个指示，都得到了合情合理的解释。正如同1958年的整风运动创造了“大跃进”的集体逻辑一样，1964到1965年的文艺整风和文化批判创造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为核心内容的集体逻辑。两者都为激进主义思潮的深入人心立下了汗马功劳。

毛泽东说过，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看了《早春二月》的样片，周扬只是觉得“缺乏时代感”，惟恐像《武训传》那样，“又惹乱子”，初次

¹ 张天翼：《评〈林家铺子〉的改编》，载《文艺报》1965年第6期，第10页。

² 古斯塔夫·勒庞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第99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³ 参见古斯塔夫·勒庞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第二卷第3节，“群体领袖及其说服方法”。作者对这三种方法做了如下解释：断言法即“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力。”但是，如果没有不断地重复断言——而且要尽可能地措辞不变——它仍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得到断言的事情，是通过不断重复才在头脑中生根，并且这种方式最终能够使人们把它当做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即从长远看，不断重复的说法会进入我们无意识的自我的深层区域，而我们的行为动机正是在这里形成的。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会忘记谁是谁那个不断被重复的主张的作者，我们最终会对它深信不移。”“如果一个断言得到了有效的重复，在这种重复中再也不存在异议……此时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强大的传染过程于此启动。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在群众中都具有病菌一样强大的传染力。”（103—104页）

观赏《早春二月》的观众“则是一片赞扬之声”¹。经历了《武训传》批判等多次思想改造运动，周扬、专家和观众如此“落后”的事实，证明了艺术规律和审美体验的难以抵抗，也证明了毛泽东上述论断的深刻入微。而随之而来的全民性的清算运动，则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以往的思想改造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批判者/知识分子们之所以会编造出如此荒谬的“故事”，并不能仅仅归结到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也不能只从1957年的反右，或1958年的“大跃进”算起。这是一个长期的、渐变的思想整合的结果。正是这种整合在人心中建立起了一个共同的逻辑体系（叙述结构）。正是这一逻辑体系，使人们，首先是电影人，顺理成章且热情愉快地接受了关于文革的“故事”，接受了“根本任务论”、“主题先行论”和“三突出”创作原则。

这一次电影清算运动，上承1959年的“拔白旗”运动，下启1966年2月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它成为江青否定17年电影的前导，成为文革中的电影大批判的先声。一年又四个月之后（1966年4月11日），中宣部发出了第三个同类文件——《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一些坏影片的通知》，《舞台姐妹》、《两家人》、《兵临城下》、《桃花扇》、《阿诗玛》、《逆风千里》、《球迷》等七部影片被列入“坏影片”。与此同时，电影界掀起了新一轮的、更激进的清算：瞿白音《电影创新的独白》、程季华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和所谓“黑八论”成为批判对象。

在这场清算运动方兴未艾之际，江青以山东省人大代表的身份参加了1964年12月至翌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激进主义的文艺旗手正式走上政治舞台。

【书海泛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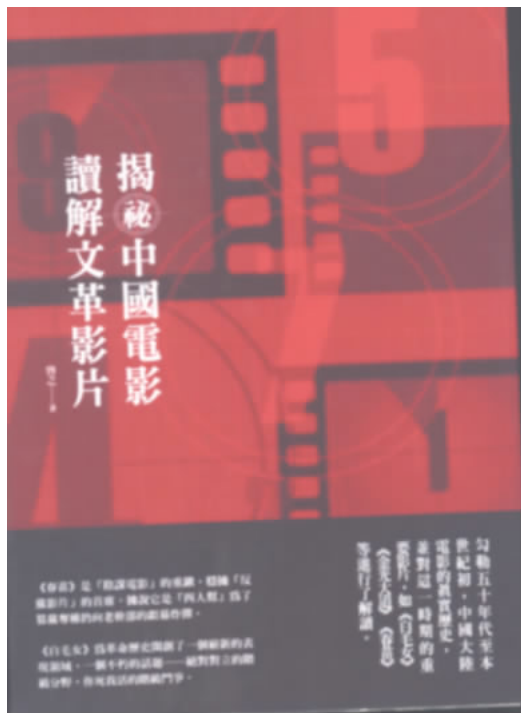
《揭密中国电影 读解文革影片》自序

启 之

按：《揭密中国电影 读解文革影片》一书由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3月出版。

¹ 黎之在他的书中谈到《早春二月》放样片时的情形：“京剧会演期间，电影《早春二月》完成样片，请茅盾、周扬、夏衍等文艺界领导和一些专家审查，当时去了许多人，北影的中型放映厅坐得满满的，看完影片后，留下部分领导人和专家谈意见，发言者对影片的改编和摄制都给了较好的评价……周扬则对影片提出了批评，说男主人公萧涧秋的彷徨苦闷表现得充分，而最后的出走显得无力，会给人留下没有出路的印象。缺乏时代感。搞不好，公映后，会像《武训传》那样受到批判。请茅盾修改。这时会议室外，跟着来看影片的人则是一片赞扬之声。会场内外完全两种气氛。听说周扬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不太理解。我理解周扬更多的考虑到当时的形势，恐怕又惹乱子。”见《文坛风云录》第444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本书所收之文，大部分因触了文网而被“枪毙”，小部分虽然侥幸发表，但也惨遭刀斧。可以说，这个集子是尸体的展览厅，残疾的修复所，言论管制的纪念碑，“胜利大逃亡”的成绩册。



有一次开会，遇到了杨、王两位搞电影研究的同仁、博导，杨导冲我嚷嚷：“嘿，你可真够狡猾的，闷头为自己写书。不像我们，为课题忙活，净说些言不由衷的话。”

我知道，他所说的，我的“狡猾闷头之作”，指的是我在港台出的书。但我不想让他在会场上道破，只好低调处理：“唉，写不好瞎写。”

可杨导不依不饶：“别装了，一看就知道，你是蓄谋已久，下了大功夫的。”

我想跟他说，“功夫是下了不少，可谈不上蓄谋已久，只能说逼上梁山——此间文网森森，我只好另谋出路。”可是，

在这场合，我不想跟他多费口舌，只想赶紧结束这场谈话，就搪塞道：“你们的书是主流，学生必读。我的书是支流暗流，没人看。”

杨导拍拍我的肩膀：“得了得了，现在没人看，以后有人看。不像我们的书，应景之作，红火一两年，就成了文化垃圾！”

我嘴上说，哪里哪里。心里不禁佩服他的明达和坦率。佩服之余，不免有些腹诽：你为什么不狡猾一下呢？没人拦着你呀。老板一过生日，你就去唱堂会。

“主旋律”一开拍，你就去捧臭脚。为了区区博导，去争那些应景项目。我不去北广（当时还不叫中国传播大学），不当博导，不为评职称写书，你做得到吗？天下没有这样的好事——既能说真话、写好书，又能跻身主流，享受体制的好处……

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王导说话了：“主流之所以为主，是因为它得人心。不跟着主流，就等于跟人心做对。再说，主流也可以批评嘛，刚才在会上，你（指杨导）不是说了主旋律的文化视域不够开阔，视听修辞还有差距了吗？咱们的书，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学术含量。只要有百分之一的真话，就有价值。学术研究也不能光想着后人，都为后人写作，现在的人读什么？……”

莫言称赞对权势毕恭毕敬的歌德，诋毁桀骜不驯的贝多芬，并且还讲出了一

番似是而非的大道理。王导与莫言可以并肩携手，高举“内外通吃，好处均沾”的大旗，招揽国中的知识精英，组成一个“新犬儒主义”的联合阵线。

新犬儒与旧犬儒最大的不同，就是更善于装——对学术装着忠诚，对艺术装着虔敬，对腐败装着不满，对言论管制装着看不见。他们也批评时弊，也替弱势群体说话，开会的时候，也会热情洋溢地呼吁求真求实，义正词严地声讨学术造假。可他们说归说，做归做，更不会去碰体制。他们的学术活动或艺术创作，说到底，就是以个人得失为圆心，以体制内外的好处为半径，在不得罪权势的前提下，做着不间断的圆周运动。

萨特说，人是自由的，懦夫使自己懦弱，英雄使自己成为英雄。我算不上英雄，在体制的铜墙铁壁面前永远是个失败者。但是，即使碰得头破血流，我仍选择说真话。萨特说过：要么不写，要写就写自己想写的。我以此为原则。

这本书说的是电影，电影是第七艺术。关于艺术，我有一点感悟：人们一直以为，艺术是自由的产物。没有自由就没有艺术。不，没有自由一样有艺术，甚至有更繁荣的艺术——暴君要用它满足私欲，专制要用它点缀升平，戈培尔要用它鼓舞士气，日丹诺夫要用它表明政绩。艺术有久暂，有传世的经典，有一时的娱乐，有短命的献礼，时间就是裁判。盐碱地上虽然长不出庄稼，但总不乏碱蒿、羊草和西河柳。

按表现形式，我们可以将艺术分为音乐、舞蹈、绘画、文学、戏剧、电影等等。假如换上另一种标准——把艺术家对待权、钱的心电图，外化为身体的姿态，我们就会惊异地发现，屈膝、俯仰、站立足以概括所有的艺术。

屈膝，可以是跪倒尘埃，匍匐不起；可以是两股战战，低头哈腰。不管是哪一种，其心思都是一样——如何讨主子欢喜。天下的主子都爱听奉承话，都爱看到自己的伟大形象，贤明如唐太宗者也免不了想杀掉直谏的魏征，无常如唐明皇者竟会让口蜜腹剑的李林甫连任十六年宰相。所以，迎合上意就成了这种艺术的永恒主题。

俯仰，不是“仰观宇宙之大，俯察万物之盛”，而是“与世浮沉，与时俯仰”。这种姿态对身体头脑和神经系统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说，屈膝只需要奴才的智商，腿和腰的协调；那么，俯仰则需要灵活的颈椎、柔韧的脊柱，发达的头脑，阿Q的情怀，以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机敏。“俯”自然免不了摧眉折腰，与奴婢相类，但是“仰”却足以补苴罅漏，修复形象。

仰，有时是精湛的艺术，有时是爱国的情热，有时是莫谈国事的超脱，更多的时候则是有奶便是娘。以“奶”为底线，就免不了当一当奴才。《鬼子来了》里面有个街头“艺术家”，日本人得势时，他在街上眉飞色舞地说评书——

众位安静请压言，
咱不论古说今天。
皇军来到咱家乡地，
共建大东亚共荣圈。
皇军来了救苦救难，
咱应该大开门户如迎亲人一般。
八百年前咱是一家，
使的一样方块字，
咸菜酱汤一个味儿。
有道是：打是喜欢骂是爱，
‘八格牙路’我不见怪，
往后哇‘米西米西’皇军他给，
皇军和咱亲密无间，
乡亲们往后不用受穷苦，
‘约西约西’，‘大大的约西’笑开颜。

日本子刚一投降，他马上有了新词——

硝烟散去万民欢，
中国人抗战整八年

.....

打得小日本蹶着屁股撂着蹶子的跑，
他们跪在了国军的面前举着个双手，
哆哩哆嗦缴械投降浑身打颤，
嘴里头说：‘我的八格牙路干活！
你的三宾的给！
这就是小日本侵华可耻的下场，
我们迎来了和平胜利的这一天，
看今朝山河光复多灿烂。

.....

《法门寺》中的贾桂虽然站着，其实时刻准备跪下。所以没跪下，是因为主子最近想起了人权的缘故。艺术分等级，有钦定的样板，有精英的好恶，有民间的口碑，公道自在人心。俯仰不是站立，俯仰的艺术是骑墙的艺术，犬儒的艺术，

投机的艺术，随波逐流的艺术。它们不能长久，尽管俯仰艺术家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大丈夫能屈能伸。

站立的艺术，人人都懂，知易行难。站立，是人与猿的区别，是人类进化的终点。如果说，“屈膝先生”用大肠代替大脑，“俯仰君”靠脊椎指挥行动，那么，“站立者”则以颈上之物决定行藏取舍，其作品多真实，尚批判。因其真实，故而久远；因其批判，故而深刻。

为作品出生，“站立者”也须俯仰——向权力妥协，与孔方周旋，或令真实褪色，或请有司宽松，虚情假意，言不由衷。他深知，权力随时可以翻脸，把他和他的艺术打入死牢。他明白，没有财神的滋养，艺术就会枯萎，以至胎死腹中。但是他有一个不变的宗旨：说真话，说不成真话时不说假话；非说假话不可的时候，蓄须养志，如梅兰芳。因为抱定这个宗旨，站出来的作品，总是难得问世。委屈辛苦一场，名位财色统统泡汤。古今中外，肯用这“四大皆空”来换取此类作品者，少之又少。

由此可知，一部艺术史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枣核，“站立者”与“屈膝先生”各守那尖尖的上下两端，圆滚丰满的中间部分则由大大小小的“俯仰君”占据填充。同属“屈膝先生”，古今不同。古人愚拙，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就是奴才；自己的艺术是“奴婢的艺术”。今人聪明，当了奴才却以主人自居，且引经据典，证明奴才的艺术就是主旋律。“俯仰君”不肯苟同，仗着人多势众，给奴才以冷面，给大众以媚眼，向主子争正统，向缪斯发声明：俯仰是艺术的最高哲学，从三皇五帝到于今，艺术就在俯仰中求生。因此，没有俯仰就没有艺术；俯仰艺术才是真正的主旋律；俯仰艺术家才是艺术史上的中流砥柱。一味屈膝下跪，迎合上意，是封建主义，是习惯势力，既有损于形象，又不利于双百。只图挺胸昂首，身心舒畅，是个人主义，是崇洋媚外，既有违于现实，又不利于和谐……出于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的考虑，主子允其请，于是，奴才听命，大众附和，站立者愈寡，俯仰艺术大盛。

基于这种认识，我给这本书的书名定为“有梦楼随笔”。“有梦楼”对应于张中晓的“无梦楼”——毛泽东时代一路无梦，后毛时代有了，梦发财、梦升官、梦出国、梦移民、梦有房有车、梦五个一工程奖……我的梦是说真话而能出版，这个梦只能在大陆之外实现。可是，对于港台的人来说，我之宏愿早已是陈糠烂谷。所以，人家要我改名。以便让读者一目了然，知道你所说的是什么。

想来想去，改成了现在这个名字。

从 1987 年到北京电影学院教书，至今，我已经在电影界混了三十多年。N 年前，电影家协会就要我填表，先是会员，后是理事。这些表格都被我随手扔了。上大学的时候，还不知道陈寅恪，更不知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念

兹在兹的只是“人生贵在适志”。三十多年来，适志的事情少，拂意的时候多，而这本书则是少中又少者。

于北京樱花园

2013-1-6

【书海泛舟】

电影《艳阳天》读解 (揭密中国电影 读解文革影片) 选读)

启 之

一、取消土地分红：第二次土改

《艳阳天》写的是《金光大道》之后的故事，但是写、拍在《金光大道》之前。江青对它称赞不已。而浩然更喜欢《金光大道》。推其原因，大约是《艳阳天》过分地迎合了六十年代的精神，更像他自己说的那种“政策宣传品”¹。

《艳阳天》讲的是东山坞高级农业社的故事：1956 年秋天，东山坞遭受洪灾，书记马之悦和队长马连福拿了国家救济，却要卖种子渡荒年，被民兵排长萧长春拦下。1957 年，东山坞换了领导班子，萧长春当上了书记，马之悦降为副书记。这一年小麦丰收。队长马连福代表土地多的中农，要求按土地分红。萧长春代表劳力多的贫农，主张按劳力分红。暗藏的历史反革命马之悦阴一套阳一套，表面支持萧长春，暗地里勾结地主马小辫，企图利用中央整党和鸣放的机会，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

主创者以如何分红开头是颇具匠心的，从主题上讲，它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开端；从叙事上讲，它是此后一系列戏剧冲突的导火索。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自然而然地就会走向阶级斗争。毛时代流行的剧作法有个一定之规：要让观众明白两派的分歧，就一定要来一场大辩论。辩论时一定要让群众参加，以便体现依靠群众。《金光大道》把大辩论的会场放在了在村委会门前，《艳阳天》把会场放在了大队部——

炮筒子马连福高声嚷嚷：“去年遭了灾，今年就得搞土地分红。要不这高级社有什么搞头！”

队干部围上来，七嘴八舌地责问他的屁股坐在哪一边。

马连福吐苦水：“我们一队的中农多，你不搞土地分红，人家就要退社呀。”

¹ 肖伊宪：《电影剧作笔记》《创作回顾一：〈金光大道〉上中下》
<http://zonghe.17xie.com/book/10000155/2623.html>

萧长春问在场的中农是不是要退社。没人说话，萧长春让有旺讲。有旺改口，说劳动分红他会分更多的麦子，不打算退社。当众拆了马连福的台。

积极分子们劝告马连福：“你别抱着老黄历了，这是高级社。”

连福气哼哼地讥讽：“高级社？高几尺？高几丈？”

萧长春站起来，大眼圆睁：“高级社就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让全体社员共同富裕。”

马连福跺着脚，向中农求救：“你们为什么不说话，人背后，你们浑身上下都是嘴。动真格的了，你们的舌头让狗咬去了？”

“弯弯绕”大着胆子小声嘀咕：“那，土地多的人不是太吃亏了吗？”

“弯弯绕”说的是中农们的心里话。¹

土地多的为什么吃亏了呢？因为当初入高级社的时候，土地是以入股的形式交给集体的。如今章程改了。土地的股份取消了，这就意味着他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土地，节衣缩食保住的土地，白白充了公。

萧长春批驳“弯弯绕”：“想吃地租呀！旧社会咱们东山坞数地主马小辫地多，他就是靠土地来剥削咱们。土地分红带有剥削性质，就得改造它。”

话说到这份儿上，谁还敢替土地分红说话？这又是一个“双层文本”——中农们理亏的背后是恐惧。这恐惧来自土改——地主马小辫的命运正在朝他们招手。这恐惧又来自当下——“剥削”的大帽子随时都可能扣在他们头上。

想起当年加入高级社，他们不禁悔青了肠子：怎么没把地卖了！

第一次入社给农村带来的震荡，他们记忆犹新。浩然更是心里有数：“不光是有房有地产的户，也不光是下台干部，而是普遍的恐怖和不安，有粮食的埋粮，有衣服的藏衣，有鸡的杀鸡，有猪的杀猪——吃到肚子里总比让别人分去好得多。”² 1977年，峨嵋电影厂拍了一部叫《春潮急》的农村片，这大概是唯一一部涉及到这方面内容的电影：四川农民怕入社吃亏，除了杀牛宰羊之外，还大砍自家的竹子去卖。史学家看到这些情节，或许会大感安慰——《金光大道》和《艳阳天》留下的空白终于得到了填补。

刘少奇当年就知道：“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私有权在今天的中国的条件下，一般地还不能废除，并对提高社会生产力还有其一定的积极性。”“在农村对私有制又动又不动是不对的，太岁头上动土，你去动摇一下，削弱一下，结果猪牛羊杀掉。”³

入了高级社，没什么可杀的了，只能拿土地分红说事。不让土地分红，马连

¹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毛泽东加了按语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选本）中曲折地反映了这一点。4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² 郑实采写：《浩然口述自传》11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³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福就撂挑子不干。解决的办法老套但有效——萧长春追上他，跟他忆起了旧社会的苦：他们两家都没地。年根底下，他们小哥俩饿着肚子给马小辫磨面，长春饿昏在磨盘下，连福他爹塞给他一块菜饼子。长春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马小辫看到，挥起手杖，将他打倒，连福爹上去扶，马小辫将连福爹踢开……

听到这里，连福抱着脑袋，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光流泪不行，还得承认错误。主创们让连福爹挥舞着木棍，冲将过来：“我得揍扁了这个忘了本的东西！”要不是萧长春拦着，连福的脑袋不被打扁，也得打破——阶级意识和传统伦理“强强联合”，把马连福拉到了正确路线一边——他幡然悔悟：“我错了，我被人家当枪使了。”

土地分红的根子在财产私有，这一天经地义的观念来自牢不可破的人性。萧长春想改变人性，把问题引向阶级斗争。果然，敌人露出了狐狸尾巴——“弯弯绕”听信马立本散布的谣言，一边悄悄地卖余粮，一边装着没粮吃。马立本牵出马之悦。萧长春从四爷那里知道马之悦有历史问题。乡里的王书记给他们带来了更惊人的消息：右派乘着大鸣大放的机会，要把共产党赶下台。问题进一步转化，从东山坞伸展到赤县神州，从一个农业社的分配方案上升到党国命运。

这不是浩然个人的思路，而是政治的思路。这不是一部影片的叙事，而是所有文艺作品共同讲述的故事。乱由上作，上纲上线并非下边发明。

为了破坏土地分红，马之悦狗急跳墙，命令马小辫害死萧长春的独子小石头。影片从此进入高潮：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影片一样，阶级敌人被当场逮捕——马小辫和马之悦都成了反革命，一个现行，一个历史。

于是，举社欢腾，劳动分红戴上了光荣花，土地分红成了臭狗屎。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一跃而进入了“全社会主义”。¹毛泽东预言：“到1967年，粮食和许多其他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²

浩然后来在小说《苍生》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富裕中农，舍不得自己的几亩地，死活不入社，可他儿子积极，非入不可，不入就分家。老人想不开，吊死在后院的歪脖树上。儿子从此得了疯病，只要一说入社，马上犯病。社里没法，只好让他单干。三年困难时，别家没粮，他有。于是娶上了媳妇。

《艳阳天》里那些把高级社当心肝宝贝似的人们，如果知道这个疯人的事迹，大概会后悔把土地交了公吧？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中农的土地归了公心疼，贫农就不心疼？他们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土地交给集体？萧长春用“当家作主人”，用“社会主义”来解释。这些大道理用在少数党员干部身上尚可，用在大多数人身上，恐怕讲不通。

¹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选本）第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² 同上。

贫农把土地拱手上交，是因为它们来得容易。他既没有为它花钱，也没有为它出力，只是凭着一个贫下中农的成分，就从政府手里无偿得到了土地。既然是政府送的，政府就可以收回去。贫下中农没为土地付出什么，也就不会像中农那样心疼。

这个道理，经济学家早就讲过：“土地改革形成的产权制度无疑是一种土地的农民私有制。但是，这种私有制不是产权市场长期自发交易的产物，也不是国家仅仅对产权交易施加某些限制的结晶，而是国家组织大规模群众阶级斗争直接重新分配原有土地产权的结果。由于国家和党的组织领导对突破无地少地农民在平分土地运动中不可避免的‘搭便车’行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平分土地的结果又可以经过国家的认可而迅速完成合法化，因此领导了土地改革那样一场私有化运动的国家，就把自己的意志铸入了农民私有产权。当国家的意志改变的时候，农民的私有制就必须改变。”¹

这是中国农村的第二次土改。第一次土改，把地主的土地分给了贫农，搞了一个平均主义。第二次土改把中农的土地交给集体，又搞了一个平均主义。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是平均主义三连跳。“共产风”由此有了舞台。

二、“黑五类”、“变天账”与“狗崽子”

江青没看过《金光大道》，但看过《艳阳天》，小说、电影都看过。她告诉浩然，当看到小石头被马小辫害死的时候，她心里很难过²。这未必是假话，也未必是装。与普通人一样，江青也有同情心。相信当初为这一情节难过的读者/观众不在少数。尽管它很假。

说它假，是因为这个情节不合情理。马之悦指使马小辫害死小石头，为的是搅乱人心，让社员们去找小石头，使麦子全烂在垛里。而马小辫接受这个任务是因为，社里计划修的水渠要经过他家的坟地。马之悦应该知道，爱社如命的萧长春不可能让到手的麦子因为小石头而发芽变质。马小辫应该知道，他就是把小石头杀了，也拦不住人家修水渠。与其拿老命冒险，不如听社里一劝，把祖坟移走。显而易见，影片没有给马小辫提供充分必要的理由去冒险犯难。

浩然承认，《金光大道》的缺点是“非常突出血统论”³。其实，毛泽东时代的文艺都如此。与神圣化工农兵相对的，是妖魔化“黑五类”。他们全部是无恶不作的坏蛋，并且承包了天下所有的坏事：《暴风骤雨》中的韩老六欺男霸女，

¹ 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顾》《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5年第6期。

² 郑实采写：《浩然口述自传》247、25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³ 同上，240页。

图财害命。《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强奸民女，杀害无辜……土改分了他们的土地财产，他们怀恨在心，《槐树庄》（1962，八一厂摄制）以阴森恐怖的视听语言，将地主阶级对土改的仇恨，以及无法排解的痛苦搬上了银幕——

1947年农历十月初三是地主崔老昆家的财产被抄没的日子，崔老昆定了家规，每年的这一天全家禁食。在合作化热潮中，这一天来到了，他的孙子崔万宝饿得受不了，跟妈要吃的。万宝他娘悄悄地给了儿子一块饼子。病体支离的崔老昆闻见，悲愤交集，抓起刀子砍向儿媳。随着一声“我的家都败在你们身上了”的哀鸣，老地主断了气。临死前，他给孙子崔万宝留下了“变天账”：

万宝孙儿记住，民国三十六年十月初三，贫农团成群结伙闯进咱家，抢走文书，拉走牲口，分走粮食。领头的有永来他娘，狼心狗肺。有朝一日，千刀万剐。刘老成也不是好东西。谁分了咱家的财产都详细地记在下面……

这个“变天账”成了“黑五类”阴谋变天的活样板。从舞台走向了银幕，从艺术变成了现实。它是警钟，激起了全国人民对“中国犹太族群”的仇恨。它是教科书，教育了马连福一类思想麻痹的干部。它是进军令，号令“红五类”去“保卫胜利果实”。它又是助燃剂，点燃人们推行专政的热情，也助长了“红五类”实行“红色恐怖”的干劲。

变天就要杀人，《夺印》（1963，八一厂摄制）是第一个以这种极端手端来呼应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反革命陈景宜伪造历史，混入小陈庄的领导班子，与会计陈广西相勾结，用小恩小惠，吃吃喝喝拉队长下水。从而掌握了队里的印把子。陈景宜派陈友才偷卖稻种，损公肥私。何书记来到小陈庄，拒腐蚀，清队伍，陈友才觉悟，要揭发陈景宜、陈广西，二陈凶相毕露，杀人灭口。

《艳阳天》沿袭了《夺印》的模式，为文革故事片开了“杀戒”。从此，“黑五类”杀人害命在银幕上接二连三：反革命分子胡守礼企图制造山洞塌方企图害死孩子们（《向阳院的故事》）。地主凌金财、坏分子韩老五偷卖鸭群被发现，意将根生和阿勇置于死地（《阿勇》）。地主孙光宗在毁灭罪证时被民兵发现，竟拔刀扑向大队书记高山花（《山花》）。旧社会的药铺掌柜孙天福把持卫生所，营私舞弊。被赤脚医生红雨察觉，孙持刀行凶，要把红雨捅死（《红雨》）。投机倒把分子刘连发知道红梅要揭发他，串连同党，暗害红梅（《山里红梅》）。逃亡地主范克明怕张金兽说出他锯断车辕的真相，挥刀砍向了这个二流子的喉咙（《金光大道》）……

制造“黑五类”杀人是“血统论”的最高表现。对于编导来说，这样讲故事最利于表现主题，最便于展开戏剧冲突，也最容易吸引眼球。而对于“红五类”，

尤其是干部子弟来说，这种故事最能够满足他们对革命的想像——“黑五类”的阶级报复唤起了他们的警惕心，银幕上的刀光剑影强化了他们的接班人意识。高大泉、萧长春、周挺杉等新时代的英雄成了他们的人生楷模，沉浸于紧张、焦虑和神经过敏当中成了他们崇高的人生乐趣。

如果说文革前的《槐树庄》、《夺印》为北京大兴县的“黑五类”灭门案，老红卫兵的打死师长提供了理由的话，那么，《艳阳天》《金光大道》等文革故事片，则为这些暴力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而对历史“宜粗不宜细”的政策，则使那些“党卫军”、“冲锋队”至今仍以英雄自居¹。

崔老昆的“变天账”是写给孙子崔万宝的。不管万宝对它是接受还是拒绝，是赞成还是反对。他都要以剥削阶级的残渣余孽，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的身份，承担起“黑五类”继承人的时代使命。按照“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的政策，这些人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按照“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原则，这些人被视为“狗崽子”。当“红八月”到来之时，他们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杀戮、殴打、批斗、关押和驱赶回老家的对象。

对于浩然来说，如何描写这些“狗崽子”始终是一个难题。他心里明白，与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子女一样，地富子女也是形形色色。比较而言，在这些人之中，知书识礼、禀赋优秀者较多，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拥护新社会，愿意跟党走的。曾经救他急难的白大叔，有一个独生女儿玉儿，聪明美丽且善良。因为土改中白大叔成了地主，玉儿离家逃亡，生死不知。正是这种认识和经验，促使他在1956年创作了中篇小说《新春》，“写几个地主和地主子女，土地改革时被清算，被扫地出门，经过曲折的反复的痛苦和磨练，脱胎换骨变成新人。最后以一位优秀分子当选了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胸前戴上光荣花，被全村村民敲锣打鼓欢送赴会为结局”。

但是，政治给了他当头一棒。1957年秋，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萧也牧，将这篇小说悄悄地退给他：“你这小说，现在看来有些危险，拿回去自己处理吧。”浩然急急如惊弓之鸟，慌慌似漏网之鱼，一口气跑回家，打开火炉，将稿子一页一页撕下填进炉子里，直到最后一张纸化成灰烬。垂暮之年的浩然，说起此事：“几十年来我一直刻骨铭心地感激萧也牧同志，当时的他，如果像有的人那样（这样的英雄我可见识不少），为了自己立功赎罪和表现自己的革命性而把我的《新春》交给组织，那么，我的结果该是怎样的悲惨？”（郑实采写：《浩然口述自传》267—269页）

这个心结，十年后在《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中得到隐秘曲折的反映——《艳阳天》中的马小辫没有家眷，孤身一人。《金光大道》中的歪嘴子连面都没露。逃亡地主范克明、漏网富农冯少怀和不法奸商沈义仁全没有子嗣。唯一例外

¹ 2011年12月26日，北京举办了“联合行动四十五周年纪念会”，与会者林小仲评论：“有的人还是那样张扬，似乎行走在水浒传的聚义厅。”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7d76b78a0100zmwj.html

的反面人物是党内新生资产阶级张金发。他有一个女儿，叫巧桂，此女心地纯洁，容貌秀美，年纪虽小，政治觉悟却很高，她不满于父亲的发家致富，主动向组织靠拢，自愿做了高大泉的耳报神，从而得到了党的信任和关爱。

在文革结束三十余年后，大陆出现了两个电子刊物，一个叫《往事微痕》，一个叫《黑五类忆旧》。它们记载了“黑五类”在毛泽东时代的真实生活。

2010--3

【书海泛舟】

“红色话语”：词汇 (《毛泽东时代的语言》选读)

按：本篇节选自启之著《毛泽东时代的语言》第三章，该书稿尚未出版，还在征求意见进行修订中。

一、概说

革命能改天换地，却改不了语言。“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三年零九个月，“消灭”了三大差别，“消灭”了商品货币，消灭了三分之一人口，就是没法消灭高棉语。

革命改不了语言，却能改词汇，改文风。法国大革命时，贵族语言跟着老爷夫人小姐一起流亡国外。平民语言、菜市大妈的语言，粗鲁粗野粗鄙的语言当家做了主人，占据了大大小小的报刊和高高低低的话剧舞台。可是，“经过了当权的资产阶级清洗过的法国语言，仍然不可能恢复 1789 年以前的面目。革命在法国语言上烙下深深的印痕。”（拉法格：《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73 页，罗大冈译，商务印书馆，1985）

中共建政，重整河山，一统思想，语言首当其冲。胜利者刊发社论，要拯救语言于混乱之中，使之走上“纯洁而健康”的沧桑正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是使用这种活泼、丰富、优美的语言的模范。在他们的著作中，表现了我国现代语言的最熟练和最精确的用法，并给了我们在语言方面许多重要的指示。我们应当努力学习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继续发扬我国语言的光辉传统。”社论还告诉人们，毛与鲁的著作“表现了我国现代语言的最熟练和最精确的用法”，他们“写下的每一句话都有千锤百炼、一字不易的特点。”毛为语言的使用制定了正确的原则，鲁迅则是“实现这些原则的模范”。（1951

年6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

这里所说的语言，指的还是词汇。“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不是说要创造一种新汉语，而是说，第一、要去旧迎新，第二、要有规矩方圆。

语言的背后是思想文化，要让它们去旧迎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经过十几年一波又一波的思想改造，到1966年，去旧迎新才有了些本钱。这一年的2月，一个划时代的“伟大”文件诞生。此文件有一个很长很啰嗦的名字：《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林彪同志委托”是毛泽东亲自加上去的。文件中有这么一段话：

我们应该以做一个彻底的革命派而感到自豪。要有信心，有勇气，去做前人所未做过的事，因为我们的革命，是一次最后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和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我们要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去创造无愧于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新文艺。这是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

江青在这里表现得相当谦抑，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何止是新文艺！文化大革命革的是文化的命——破了旧文化，立了新文化。

这个新文化首先表现在红色话语及其语体上面。为了简便，我称它们为“红色话语”。“红色话语”不是另一种汉语，它是词汇、修辞、文风、语体上发生了或大或小变化的现代汉语。它萌芽于四十年代，成长于五十年代，成熟于六十年代，大盛于文革十年。

（一）“红色话语”的词汇构成

“红色话语”之特色，首先体现在词汇上。它的词汇由政治、战争、粗口三大块组成。政治统帅一切，政治运动频仍，每个运动都产生大量的政治词汇。政治词汇在口头、书面渐占优势。建政之初，大批指战员转为地方干部，他们把大量的战争语言带进了媒体、会议和课堂，成为日常语言的组成部分。

粗口忝列其中，原因如下：

第一，社会的价值取向是工农兵化，从四十年代的“与工农相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到六七十年代的“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以贯之。工农兵，主体是农，农乃粗口之渊薮，脏话之大本营。

第二，国家的管理者大都来自这个大本营，他们借助政权之威，革命之义，将其习惯的语言大面积地灌输给社会，以粗野为美遂蔚然成风。东北干部说话必带鸡巴、屌，西北干部言必称毬，四川干部张口闭口龟儿子，江浙干部离不开娘希匹，“他妈的”则通行全国。

文革前，粗话是上不了台面的。作为革命的象征，它们只是出没在口头上，潜伏在下一代的意识里。到了文革，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把“这些混蛋们”写到大字报里，北京的小女生苦练“×你×”，以加入红小兵。这些都是工农兵文化长期浸润之果，绝非革命造反一日之功。

（二）“红色话语”的词汇来源

“红色话语”是个大家族，词多势众，声威远披。虽然处处高人一头，但在语言学上，却搞不了特权，跟《语言学概论》中的词汇一样，这个家族也有基本词和一般词之分，也有通用词和专用词之别，也有外来语和固有语之异，它的基本词汇也具备全民常用性，历史稳固性，构词能力强等特点。（参见高名凯、石安石主编：《语言学概论》，第四章，中华书局，1963年。刘伶、黄智显、陈秀珠主编：《语言学概要》，第四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红色话语”基本词的来源有二，一来自苏俄，一来自本土。外来者以马列主义的理论词语构建，本土者以建党建军之词语组成。这两种基本词，就仿佛是两条强大坚韧的树根，深扎于岩隙石缝之中，虽曾低萎槁悴，生意几尽，但经井冈山徙植，遵义移根，终获地利，得天时。于是开花延河之滨，结实明代之都。及至文革，赫赫然根节盘魄，主干崔嵬，枝叶葳蕤，山崖表里，华盖遮天，俨然南伯子惊叹的“此必有异材”的商丘之木。

这商丘之木的两条根，也就成了“红色话语”的奠基，为党史所必写，课程所必设，学生所必修，升学所必考。

“红色话语”一般词是这商丘之木的枝叶，它们多由政治运动之词叠加积聚而成。如：土改、镇反、批《武训传》、三反五反、反胡风、评《红楼梦》、批胡适、工商业改造、反右派运动、三面红旗、反右倾、三年困难、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学雷锋、学解放军、文艺整风……

经过多年的积蓄和培养，“红色话语”掌控了大量的基本词和一般词，有了称霸口头书面的资本。文革一来，“红色话语”抓住机会，闪亮登场。与此同时，它也为“红色话语”词库贡献了大量枝叶性词汇：三家村黑店、红卫兵、造反派、资反路线、夺权、喷气式、文斗、武斗、二月逆流、地派、天派、百万雄师、杨余傅、小爬虫、新鲜血液、上山下乡、可教子女、大联合、三结合、三支两军、

批林批孔、五七干校、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五一六、一斗二批三改、反击右倾翻案风……

这些词语，每一个都标志着一段历史，每一个都记载着一场社会运动，每一个都丰富了党史，每一个都可能成为卖萌主持人的拦路虎——某电视台主持采访某老，老人说到工商业改造，主持人一脸茫然。老人说到反右倾，主持人抖了一个机灵：啊，就是反右派运动吧？

老人请她走路。

（三）“红色话语”的词汇特点

“红色话语”之新在词汇，它搞了一个“破旧”：禁用封资修词汇，禁用私人性词汇，爱情、亲情、乡情统统扔掉，换成阶级情、党国情、领袖情；禁用模棱两可、游移不定的词汇，似乎、可能、好像、也许、大概，一律下岗，换上一一定、必须、真正、彻底、不折不扣等明确坚定之语。

“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第一，大量地征用副词，如：最、极、极其、极为、更、更加等，赋予某些副词，比如“最”，新的语义功能，打破语法的限制。

第二，大量地招聘形容词，如：大、新、一小撮、无限、无比、一定、必须、真正等。让它们在讲话、文章中获得最大限度的话语权。

第三，大量使用短语/词组（三字、四字、多字，如英雄的豪言壮语和被加工过的“闪光的语言”）等被政治化的惯用语。让它们成为讲话作文的固定成分，从而使天下文章都变成一个样。

二、“红色话语”的副词

（一）最最最

邻家有个五岁的小女孩，小名圆圆。你要问她，你家的狗狗跟圆圆好吗？她会说：“我家的狗狗是我最好最好最好的朋友。”你再问她，圆圆有这么多娃娃，哪个你最喜欢？她会把那个金发碧眼的洋娃娃抱起来，偏着头，立起食指：“这个小芭比是我最最最最喜欢的娃娃。”说多少个最，依她的心情而定。

这让我想起曾几何时充斥媒体的语言：“我们心中最红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不由得想：那时的成年人，怎么越活越抽抽（北方方言，指年纪越大，心智越像小孩子。即南方所说的“老还小”），会

像学龄前儿童一样说话？

抽抽是一种病，它有一个从潜伏到发作的过程。从语言学上讲，潜伏期的表现是“万岁”的普及——中共建政前后，知识分子对“毛主席万岁，很不习惯。”

（吴晗：《吴晗自传书信文集》16页，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喊‘万岁’之类的口号，……张不开口。”（季羨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载《东方》1994年第5期）。清华大学的学生还对此提出了疑义：（喊万岁）“是封建残余而且是唯心论。”共产党相信唯物主义，怎么还万岁万岁地喊呢？（中英杰：《我与罗兰在大风潮中》，《记忆》三，45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后来知识分子想通了，习惯了。“万岁”也升级换代，变成了“万寿无疆”。凡人成了神仙，就免不了有舐痔结驷的阿谀之徒，免不了鸡犬升天的腐败之事。结驷和升天是体温和血相，它昭示着“抽抽病”结束了潜伏期，进入了发作期。此时的临床症状是“最”以排比句的形式，成群结队地出现——

林彪同志一贯最忠实、最坚决、最彻底地贯彻毛泽东思想，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林彪同志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最好的榜样。全军同志都应当向林彪同志学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最勇敢，最聪明，最革命的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是最有战斗力的军队，是天下无敌的战无不胜的军队。（1966年10月10日《解放军报》，）

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他对毛泽东思想钻得最深，学得最活，用得最狠，贯彻执行得最好最彻底。（1966年11月5日叶剑英在空军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李德、舒云编《林彪日记》下册，978页，明镜，2003）

第一段文字，来自于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在空军的一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短短的几句话中，就用了十个“最”。第二段文字，来自叶剑英1966年11月5日在空军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句话里就有六个最。可见，这种表述在当时已经成为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尤其是军队领导班子的共识，成了一项严肃重大的政治任务。

不要责怪萧华、叶帅。这种夸张的，令人肉麻的表述在当时正常又必须，因此弄得满大街简直是俯拾即是。不信，你翻翻那时的两报一刊，尤其是《解放军报》，就会发现，它是“最”的大本营——

《毛主席语录》，是全体干部战士最基本最经常的读物，……一些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要能够背下来。……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话，最亲切，最通俗，最生动，最深刻……

实践证明，学习毛主席语录，最便于联系实际，最容易突出重点，最生动活泼，最大众化，最有战斗性，最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1966年12月19日《解放军报》社论：《句句熟读 句句照办》）

以我的见闻，此文是使用“最”最集中，频率最高的一篇社论。用医学的术语，这标志着“抽抽病”处在发作期。发作一阵之后，此病就会进入了高危期，其标志就是最最最最的连续使用。那时候，作者、媒体以及受众的思维与表达能力，跟圆圆差不多。

（二）极为、极其、极力

枪打出头鸟，一提起文革语言，讥讽嘲笑斥责都集中到了“最”身上。其实，当时投靠权贵的副词很有几个，极为、极其都荣列其中。举几个例子——

林彪同志最近号召人民解放军，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指示，不仅对全军，而且对全党、全国人民都完全适用，都极为重要，极为适时。（《学习毛泽东思想 必须认真地学 刻苦地学》，《解放军报》社论，1966年10月12日）

当前正在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大学校。这场革命，极其尖锐，极其复杂，极其深刻。（同上）

这两段话出自《解放军报》的同一篇社论。写社论的人，当时可能有一点点踌躇：他的任务是要说明林彪指示的重要性和及时性已然达到了顶点。他在“十分”、“非常”、“极为”之间犹豫了一小会儿，最后决定选择后者。因为“十分”、“非常”比较常用，缺乏新鲜感。更重要的是，它们都难以承担把事物推向极端的语言功能。他曾想到把“十分”改成“十二分”，但是马上就摇头了——十二分重要，十二分适时——这太不严肃了。非但不严肃，简直是对社论的轻佻，对副统帅的不敬。那么，什么词能既严肃庄重又能传递出十二分的意思呢？他看中了“极为”。

“极为”之后就是“极其”。这并不是他的发明，而是天下文章一大抄的结果——《红旗》社论不是说了吗？“这场文化大革命，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一场极其激烈，极其尖锐，极其深刻的阶级斗争。”（1966年《红旗》十期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

件》) 尽管《红旗》的说法含混而空洞, 但是, 有了这个“极其”, 就会让人产生一种神秘莫测, 深不见底的感觉, 让你觉得事情尖锐得难以想象, 复杂得登峰造极, 深刻得无以复加。

这个“极其”是“红色话语”中极可宝贵的资源, 必须把它放到文章的关键处, 让它把事情说得绝对且极端, 比如, 当谈到林彪关于学毛著的指示时, 就得用“极其重要”来形容这个指示(1966年10月10日《解放军报》通讯《林彪同志向全军发出号召, 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 当提到各条战线上取得的胜利的时候, 你就得用“极其光辉的”来修饰那个胜利。(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红旗》1967年第四期社论) 但是, 热衷于“极其”的人们, 没有想到, “极其”是一个双刃剑, 一方面, 它可以操纵舆论, 堵住对“指示”的不敬, 对“胜利”的怀疑, 另一方面, 也足以把“指示”弄成笑柄, 把“胜利”搞得灰头土脸。

上初一的时候, 教历史的朱鉴珉老师批评我们词汇贫乏: “一说什么东西好, 你们就会‘十分好’, ‘非常好’、顶多是‘极其好’。看看李白,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人家是什么想象力!” 按照朱老师的观点, 我们这些生在红旗下、戴着红领巾即使跟一千年前的古人比, 也是越活越抽抽。

聊可自慰的是, 我们患的“抽抽病”, 远不如当年写文章的才子们严重。他们比我们年长, 读书多, 词汇多, 想象力应该丰富, 可是当年的报刊, 不但官家的两报一刊, 就是造反派的小报, 也是“越活越抽抽”。不信, 你看看, 电影学院、戏曲研究院和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是怎么描写刘少奇的——

刘少奇极力鼓吹“老戏很有教育意义。”把极力美化封建地主大走狗黄天霸之流的《恶虎村》鼓吹为“改得好的剧目”。(《电影批判》编辑部, 中国戏曲研究院红旗兵团, 《井冈山》报编辑部: 向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致敬——介绍江青同志为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而英勇斗争的部分事迹), 载清华大学《井冈山》第五十期)

造反才子们的唯一独特之处, 就是把官报的“极为”、“极其”, 改成了“极力”, 把副词改成了形容词, 官报吹林彪, 小报批刘少奇。虽说一褒一贬, 从思维到语言, 还是越活越抽抽。

(三) 更、更加

最、极为、极其都表示事物到了登峰造极, 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是一种凝

固、没有变化的状态。它们不能表示事物的变化，而意识形态要求某些事物是必须变化的，比如，敌人的情况就不能凝固，它必须一天比一天糟。革命的情况也不能凝固，它必须一天比一天好。如此一来，最、极就不得不放到一边，而必须启用更、更加。请看下例——

苏共新领导比赫鲁晓夫更虚弱，更加没有什么了不得，他们的日子更不好过，他们的下场决不会比赫鲁晓夫更好些。(1966年8月25日《解放军报》社论：《我们什么都不怕——纪念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发表二十周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1966年9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更广阔，更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1966年10月6日，《解放军报》：《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如果说，“最”、“极”带来的是崇拜与奴性，它使人们既狂妄无知，又匍伏在地；那么，“更”、“更加”带来的则是盲目的乐观与虚假的自信。它使人们在乐观地眺望未来的时候，大搞虚假浮夸。

(四)“抽抽病”

除了“极力”之外，这里说的都是副词，副词数量很多，是个大家庭。它们按照各自的职能，分成了若干类。表示情态的，表示语气的，表示程度的，表示处所的，表示范围的，表示频率的等等。上面说的“最”、“极为”、“极其”、“更”、“更加”都是表示程度的。

“红色话语”眼光和手段都十分了得，它知道什么是主要矛盾。利用副词修饰形容词和动词的特性，它把“最”、“极为”、“极其”抓到手里，让人们觉得事事都到了顶。把“更”、“更加”弄到麾下，让人们在信心满满中走向假大空。

“红色话语”越发达，使用红色话语的人就越抽抽。“红色话语”有个美好的愿望，它想把“抽抽病”普及到大洋国，进而普及到全世界去，让大家都像五岁的圆圆一样幸福地生活，永远也别长大。

三、“红色话语”的形容词

“红色话语”对形容词的征聘，远比对副词来得殷勤。这也难怪，形容词比副词多，作用大，它们是限制名词的，而名词是“红色话语”的两大支柱之一。如果有效地控制了形容词，比方说，让“伟大”只用在几个必要的名词前面，让“一小撮”只与“走资派”搭配，让“无限”一定与热爱，或忠诚相伴而行。让“新”或“新的”一定放在时代、阶段、水平、发展、创造、收获这些名词前面。这语言的半壁江山不就归“红色话语”了吗？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有思想然后才有行动。这语言的半壁江山意味着什么？那还用说吗！

让我们从“一小撮”说起——

（一）一小撮

“一小撮”是个表示状态的形容词，它总是放在某种人前面，表示这些人的数量既少，人头又差，令人憎恶。因此，没有人会这样说：“一小撮革命领袖”，“一小撮英雄模范”，或者“我们这些优秀学生只是一小撮”，除非开玩笑。

一般来说，“一小撮”总是放在坏人、敌人一类名词的前面，比如：一小撮阶级敌人，一小撮黑五类，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一小撮走资派。有了这个“一小撮”来修饰限制后面的名词，作者就会感到真理在手，正义在胸，词正而声高，理直而气壮：你看，坏人是极少数，好人是大多数。我，是好人的代表。

国人对“一小撮”很熟悉，反胡风，是一小撮，批胡适，是一小撮，反右派运动，打了五十五万右派，还是一小撮。到了文革，这个形容词更是不可或缺。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文的关键词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尽管这句话相当冗长，但是作者坚持让它出现了16次。

为了使“一小撮”的意思更明确，更显豁，社论还请来了另一个形容词——“极少数”，其标准表述有两种：一、“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二、“极少数别有用心坏人”。作者不厌其烦地让这两种句子重复了10次之多。

显而易见，极少数是“一小撮”的另一种表达。

此后，“一小撮”就横行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揪军内一小撮”，“打倒党委一小撮”，“一小撮反党叛国分子”“×××的一小撮死党”等等表述出没于两报一刊，传单小报，大字报、以至于田间地头。

文革结束，数百万人死难，上千万人受冤，“受打击迫害和株连的干部、群众达一亿人。”（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62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二）无限

“无限”这个词走红，要归功于个人崇拜的升温。在“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忠诚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还不足以表达内心情感的话，就得在热爱、忠诚之前加上什么词。加个什么好呢？非常？极其？十二分？最后，修辞大师们选中了“无限”。这是个正确的选择，除了“无限”，没有哪个形容词能把对领袖的热爱与忠诚提高到永无止境的地步。

于是，“无限”闪亮登场——

我军广大干部战士，对毛主席无限忠诚，无限热爱，对毛泽东思想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毛主席畅游长江和毛主席几次接见革命师生的消息传到部队后，全军指战员知道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都无比喜悦，无比振奋。大家都说，毛主席身体健康，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欢呼声，响彻整个军营。（通讯：《林彪同志向全军发出号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解放军报》，1966年10月10日）

上文摘自《解放军报》1966年10月10日一篇通讯。在此文之前，“无限热爱”“无限忠诚”已经多次在这张报纸上露面了。可以说，军报在推崇个人崇拜上是立了大功的。这当然与林彪有关。

五个月之后（1967年3月）上面的“两无限”，演变为“四无限”（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它跟“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道，成为文革前期制度化的理念，并由此产生了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忠字台，红海洋等丰富多彩的群众活动。

“无限”之外，还有“无比”。如上文中的“无比喜悦，无比振奋”。尽管这个形容词也很出了一阵风头，但是，比起“无限”来，“无比”终究略逊一筹。

到了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之际，当个人崇拜完成了发动群众，冲垮党内阻力的作用后，毛泽东对“四个伟大”说了讨厌。盛极一时的“三忠于四无限”也渐渐降温。主席收放自如的领导艺术，谦虚谨慎的伟大品格，被载入史册，成为党史学家永远的话题。

（三）大

近几年，有人抱怨“大”字满天飞，大进军、大发展、大历史、大中华、阴阳大裂变。其实，这股夸张扬厉之风早在五十年代的“大跃进”时就开始了，而文革则到了顶峰。裴宜理、李逊在《革命的粗野》一文中提到了这一点——

文革中被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词，大概可以数“大”字：“大肆”、“大打一场××战争”、“大刮妖风”、“大黑伞”、“大黑手”、“大黑帮”、“大毒草”、“大杂烩”、“大扒手”、“大串联”、“大批判”、“大联合”、“大夺权”，就连文革本身的名称也冠了“大”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裴宜理（美） 李逊：《革命的粗野》广州社会科学院 1994 年《开放时代》杂志社“开放时代之二”《现代与传统》）

两位作者认为，“大”的盛行是“夸张激烈的修辞方式”表现之一。那么，为什么人们非“大”不足以尽其心而达其意呢？这显然与群体心理和当时的语境有关。按社会心理语言学的说法，“说话人作为言语的主体，其言语活动要受社会心理的支配。受说话人心理支配的言语及其行为，应适切听话人的心理，否则是不得体的。”（王德春等：《社会心理语言学》，76 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文革时代是激情而狂热的时代，它排斥冷静的、客观的、求实的言说，提倡、鼓励夸张、浮躁的表达。“大”这个形容词适合这种社会心态。那是一个听话人左右说话人的语境。

乱自上做。跟“最”一样，“大”的盛行也是两报一刊鼓吹的结果——

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五一六通知）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一直是极力支持大串连的，并且主张把这种革命行动大大推广。……大连步行来京的学生深有体会地说：我们虽然离开了明亮的教室，舒适的床位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抛开了方便的交通工具，但是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大锻炼，大提高。（1966 年 10 月 22 日《人民日报》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大学大用、大读大讲、大写大唱毛主席语录，把毛主席语录当作最锋利的武器，一切牛鬼蛇神闻之失魄，见之丧胆。（1966 年 12 月 19 日《解放军报》社论：《句句熟读，句句照办》）

被“红色话语”征用的形容词还有不少，“一定”、“真正”、“永远”、“彻底”等等都曾在它的麾下效力。篇幅有限，我只能浅尝辄止。

四、“红色话语”中的四字语

（一）四字语

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老师让我们往本子上抄那些华美动人的词藻，抄了一年多，她发现了问题——各人抄的不一样，没法检查。于是，她改了办法，要求家长，给孩子每人准备一本《汉语成语小词典》，并勒令我们从第一页背起。她每周检查两次。不用说，她给作文打分也全看词藻的丰歉华简。谁用的成语多，就得高分。而我是高分的保持者。

装着满肚子词，我上了初中。没想到，班上一位同学比我的词更多。一次集体参观军事博物馆，回来写作文。这位同学在不满千字的作文中，用了42个“成语”，而我还不及人家的一半。老师一边口沫四溅地念这些“成语”，一边龙飞凤舞地往黑板上抄。看着黑板，我疑惑起来，光芒万丈、无比辉煌、英勇作战，勇敢杀敌，这些词在我的成语小辞典里怎么找不着呀？这位同学是不是有一本汉语成语大辞典？

二十年之后读吕叔湘的书才知道，那些不是成语，而是“四字语”。吕老说得中肯：“成语很少连着用，四字语常爱连着用。谁最喜欢多用四字语？中学生和小报的投稿者。”（吕叔湘：《文风问题散论》《吕叔湘文集》，第四卷，286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

（二）大家都成了中学生

文革来了，两报一刊中的四字语满坑满谷，各司其职——

若提到主席就是：伟大领袖、伟大号召、伟大思想、伟大红旗、伟大胜利、战无不胜，万寿无疆……；

若谈到敌人则是：滔天罪行，老实交待，悬崖勒马、阴暗角落，反攻倒算，大肆宣传，恶毒攻击，大肆鼓吹、恶毒咒骂，恨之入骨，死不悔改……

而人民群众就只能：努力学习、坚决贯彻、激情满怀、万分激动、热泪盈眶、振臂高呼、拍手称快、热烈欢呼、誓死保卫、大风大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要是谈到形势，就一定是：红旗招展、万象更新；东风浩荡，春雷滚滚；红旗飘飘，凯歌阵阵；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

这种连着用的四字语还有很多，比如，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等等，多了。其中最著名且

被用得最多的是林彪的名言：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文革“破旧立新”，摧枯拉朽，却不能创造出一种史无前例的红色话语言，这很让史无前例的革命郁闷。郁闷之余，革命想出了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向法国大革命学习。人家法国人不是用菜场大妈，打工粗汉的语言改造了法语吗？咱们为什么不能用毛主席语录诗词、无产阶级的短语词组、两报一刊上的惯用语、英雄模范的豪言壮语给汉语掺掺沙子，搞出一个“红色话语”呢？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没完没了的社论、无数英模日记的培育下，“红色话语”急剧地扩大地盘，迅速地成了口头笔下的常用语。作为“红色话语”的生力军，四字语更是磅礴万里。有了它，写文章就方便多了。首先，有了规矩方圆，人们知道提到主席的时候，应该用哪些词；谈到人民群众的时候，应该写哪些话；说到形势的时候，应该怎么说。其次，效率大大提高。因为再也不用为遣词造句费脑筋。

不用说，四字语是套话。套话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党在心中，民在心中，法在心中”；“依法治国、执政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这些四字语被冠以“公文套话”之名，成百上千，大大方方地亮相于网，大有推广普及之意。

“红色话语”中的四字语则不同，它长于自我保护，誓死否认自己是套话。因为它知道什么是羞耻，知耻而后勇，所以，一旦发现有谁说它是套话，就视其为“恶攻”，请他当反革命。

吕叔湘说，中学生喜欢用四字语。文革把成人都变成了中学生。

（三）“热烈欢呼”引人入睡

中学生喜欢四字语，因为它易记易懂，还容易凑，并且念起来还挺上口。这也是文革风行四字语的原因。并不是所有的四字语都能为“红色话语”效力。

“红色话语”接纳它们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死心塌地为政治服务；第二，必须易记易懂，为百姓喜闻乐见；第三，必须经常在媒体上露面。

也就是说，凡是被“红色话语”收到帐下的四字语，在以上三方面都要有杰出的表现。比如“热烈欢呼”吧。一开始，这个四字语并没有引起“红色话语”的注意，因为“热烈”是一个有着严重的自由主义倾向的形容词，它经常随心所欲地跟很多动词、名词结合：热烈欢迎、热烈气氛、热烈庆祝、热烈鼓掌、热烈交谈、热烈拥抱……；“欢呼”作为动词也有问题，它缺乏原则立场，可以出现在各种场合，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它会出现在人群之中；老师宣布明天放假，它也会跑来为学生们助兴。

随着形势的发展，需要它们结合起来的事情越来越多，“热烈欢呼”作为一

个固定词组，在媒体上露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多。1967年6月18日“红色话语”看到了《南方日报》的一则简讯——

本报讯，广州地区广大革命群众昨天怀着高度的自豪感，热烈欢呼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热烈欢呼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热烈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辉煌成果，千万遍地欢呼毛主席的英明预言和伟大号召的胜利实现。

一连三个“热烈欢呼”，使“红色话语”决心把它收入帐下。是啊，这场革命怎么能没有它呢？批斗刘邓陶需要它，打倒王关戚需要它，揪出杨余傅需要它，把林彪定为接班人需要它，把林彪定为卖国贼还需要它，发表最新指示更需要它。

翻翻当年的报刊，随便找一段念念，你很快就会昏昏欲睡。这并不是“红色话语”的特殊功能，所有的生凑出来的四字语都会产生这种效果。吕叔湘说得不错：“读这样的文章，像是躺在夜车的卧铺上，听车轮在铁轨上行驶，发出均匀的格登格登之声，引人入睡。”（同上，288页）

五、“红色话语”中的套话

上大学的时候，同学方志鹏在校内的游泳池里戏水，不幸溺水身亡。班里开了隆重的追悼会，班长的悼词至今还在我的日记里——

天地悲鸣，山河呜咽。我们亲爱的战友方志鹏同学两天前不幸离开了我们。我们全体同学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向他告别。（默哀三分钟）

方志鹏同学自入学以来，就积极靠拢组织，政治上要求进步，学业上精益求精。他真正做到了一颗红心永向党，刻苦学习为四化。

方志鹏同学热爱集体，乐于助人。他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他将短暂的生命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中去，我们班的同学们都怀念他。

.....

方志鹏同学，安息吧，你的精神将鼓励我们前进，你未竟的事业将由我们完成。你的音容笑貌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我们将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你的遗志，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

班长那抑扬顿挫的朗读，把同学们的哀思剥夺殆尽，反而使不少人觉得好笑

——方志鹏是个县太爷的独生子，从小家境优裕，散漫成性。政治辅导员多次找他谈话，他嘻嘻哈哈，满不在乎。

“西谚云：对善良的死者不要吐唾沫，故悼词通常都拣好听的话来说，这样就令生者愉快，死者安息。”（陈原：《陈原语言学论著》卷二，272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中国人讲面子，“谀墓”古已有之。我们的班长也算是昭续传统。问题是，他不说“天地悲鸣，山河呜咽”，“一颗红心永向党”，“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这类套话行不行？以我的了解，这类套话只能令死者不安，令生者不快。

我们班长的那些套话来自于那个时代，如果不让他用这些套话，他就不知道怎么写文章。那时候，讲话作文如果没有这类语言，就好像演员出场没有上妆，做菜没有加盐，待客没有烟酒茶一样。

我有个邻居，最早是新华社的记者，后来当上了某大报的社长。退休前，他张嘴闭嘴八荣八耻，七不准八不行。退休之后，突然变了个人，从聊天到写诗、练字，全是“亡，百姓苦；兴，百姓苦，万间官阙都做了土”一类的愤激之辞。这位老兄让我开了窍，原来天下不仅有“两头真”，还有“一头真”。

有一次，“一头真”问我：“六七十年代新华社曾经生产一种药，你知道吗？”我大惊讶：“新华社……生产……药？什么药？”

“安—眠—药！”

“一头真”解释：“我失眠，老得吃安眠药。老伴不让我吃。我就翻出来当年新华社的通讯看，没想到，一看就困，想不睡都不行。你说这药灵不灵？”

“我睡觉也不好，把你的药也给我点儿。”

“一头真”很豪爽：“没问题，我有一本1968年出的两报一刊社论汇编。药劲比新华社通讯还足，保证你没看两页，就想睡觉。”

“这可真是中国特产的安眠药。”

“你知道那安眠药是什么做成的？”

我答不知道。

“一头真”神秘地眨眨眼睛：“套话！”

“套话？”

“对，套话。那年头，套话可是记者编辑的命根子！你知道吗？我当时随身带个笔记本，专门记两报一刊上的套话。”

“一头真”所说的套话都可以归入“红色话语”的惯用语之中。这些惯用语包括三字语（拒腐蚀、永不沾，煽阴风、点鬼火，眼中钉、肉中刺等）、四字语（坚决贯彻、热烈欢呼、红旗招展、心潮澎湃等）。还有那些字数更长的习语，比如：“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等。

我们班长的悼词之所以让人烦，就是因为他满纸“红色话语”惯用语。

在“一头真”的提示下，在与瞌睡不间断的斗争中，我用了八个月的时间翻阅了1949年至1978年的人民日报，发现这种加长型习语在文革期间用得特别多。多的原因大约有两个，一个那时代英雄辈出，而英雄们都会有一些豪言壮语。比如《雷锋日记》：“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这些语言会随同英雄的事迹一起展示于媒体之上，于是它们就会成了公共财富，出没于私人日记和公共媒体。王杰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恐怕是所有的豪言壮语中影响最深远，威力最强大的一个。因为有这么一个最高指示：“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另一个原因是，那年头政治持续高温，媒体工作者为适应政治需要，要不断地从生活中寻找、加工、提炼“闪光的语言”。比如：“站在虎头山，眼望天安门，胸怀五大洲。”“要防福中变，通过劳动练。”“要让红旗飘万代，天天教育下一代。”“心中有了红太阳，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路线对了头，一步一层楼。”“海可枯，石可烂，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永不变。”“狠学狠用老三篇，狠斗私字一闪念。”“不堵死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这些闪光的语言通过媒体，走进千家万户，深入车间地头。人们一张嘴一动笔就会想起它们。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要求人们“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因为“人民的词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于是，闪光的语言和英雄的豪言壮语就都安到了人民群众的头上。我说安，是因为，它们有的来自民众，有的则来自于宣教部门的编造。如当年新华社采访32111钻井队，“最初讨论时，采访组提出，要像宣传雷锋、王杰那样，32111队也应该有自己的豪言壮语”，于是便按照当时的“时代精神”，采访组帮助钻井队“总结”。最前提的是：“把毛主席的指示落实在行动上！”后来，又觉得不太响亮，改为“把毛主席的指示印在脑子里，刻在骨头上，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后来公开报道时删掉了“刻在骨头上”这一句（李中石《参加32111队血战火海宣传演出记》，载华夏文摘增刊382期/文革博物馆通讯218期）可是它们为什么成了中国特产的安眠药呢？

最根本原因在政治。珍宝岛自卫还击战的战斗英雄孙玉国最爱引用战士的豪言壮语——

战士们豪迈地说：“苏修吹嘘机械化，坦克、装甲满地爬，轰隆一声打翻个，马上变成死王八。”……同志们豪迈地说：“敢同魔鬼争高下，不向苏修让寸分；粉

身碎骨志不移，掏尽红心为人民。”……同志们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庄严宣誓：头可断，血可流，祖国神圣领土一寸也不能丢！……陈绍光同志用他的英雄行为实现了他的誓言：“毛主席号召我紧跟，反修战场杀敌人，越是艰险越向前，笑洒热血为革命。”……战士们说：“身卧冰雪守边疆，心中升起红太阳，凛冽寒风不觉冷，股股暖流涌心房，誓死保卫毛主席，浑身是胆有力量。”……战士们说：“乌苏里江畔把根扎，苦不怕，死不怕，誓与苏修斗到底，打不尽豺狼不把战台下。”……（孙玉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永放光芒》，《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永放光芒》第一集，2—11页，人民出版社，1969年9月）

这些语言都来自人民群众，它们丰富吗？不，贫乏是它们的特征。它们生动活泼吗？不，呆滞刻板是它们的顽症。它们切实有力吗？不，矫情空洞是它们的座右铭。人民群众的语言怎么变成了这样？因为政治改造了他们的思维，他们的语言被高度政治化，失去了生活的自然本色，变成了毛泽东所说的，“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反对党八股》）

另外，高度重复恐怕也是它们变成“安眠药”的一个次要原因。再美的语言老听老说，也会审美疲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虽然也被政治化了，但它新鲜生猛，简洁有力，孙玉国在一篇不长的文章里把它重复了35遍，就让人有点烦。何况，孙玉国对它的使用不但高频率，而且高密度，请看下面这个段落——

我们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用革命的自卫战争反对美帝、苏修发动的反革命的侵略战争，我们革命战士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就是建立在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认识的基础上的。这种认识越深刻，继续革命的觉悟就越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也就越强。（孙玉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永放光芒》，《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永放光芒》第一集，页6，人民出版社，1969年9月）

在122个字里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这13个字重复了三遍，将近总字数的三分之一。你说说，除了孙玉国，谁能不烦？

“红色话语”惯用语的生产和使用是个系统工程。在这个工程中，林彪是总设计师。他创造出来的惯用语，“理解的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加深理解”；“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等，至今仍为人们所铭记。